



心系特选系列一等奖作品：王泽保《Orchids and more Orchids》



心系多元文化系列三等奖作品：白松山《Shower of Blessings》

源YUAN 二〇一八年第一期 (总第一百三十一期)

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18年·第1期·总期: 131 + S\$5.00



1942, 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 侵略与失败的象征—昭南神社 • 父子同心缔造书业传奇
- 《赤道风》33年 • 走近跨越百年的智慧长者周有光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心系中华文化系列一等奖作品：郑添辉《恭送九皇大帝回銮》



心系多元文化系列一等奖作品：陈福祥《端午传友情》



心系中华文化系列二等奖作品：徐锦福《3 Steps I Bow on Wheel Chair》



心系多元文化系列二等奖作品：Jez Shi Siew Luan《Chinese Calligraphy》

编辑语

文·谭瑞荣

时间，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似乎过得特别快，而记忆又是如此绵长。感觉去年的贺岁歌曲还在耳际萦绕，今年的新年歌曲已经唱响新加坡的各个市镇了。

新年新气象！《源》杂志也试图以崭新的姿态登场：封面，我们一改昔日的光面设计，代之以亚光的典雅端庄；内页，增加了作者头像以丰富视觉效果、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字号，循众要求，适当增大。总之，我们以期用新的面貌跟读者见面。

按华人习俗，新年期间，我们都应该说些开心的事情。但是，2月15日(农历新年除夕)，对新加坡人来说，曾经是个沉重的日子——日军占领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新加坡沦陷，从此，新加坡人民经历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一文的作者，采访了3位经历过日治时期的人士，从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新加坡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的人们，都应该正视历史，认真反思。

《侵略与失败的象征——昭南神社》及《日本731部队和新加坡》这两篇文章，就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让人反思的素材。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侥幸没有经历过那段黑暗时期，因此不存在任何记忆。但经历过的人，我相信是刻骨铭心的。就如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说：“时间的历史长河，已经带走很多东西，冲淡了太多的记忆。如今，只有通过当年遗留下来的石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史迹’的真实存在。但愿这历史的证人——石阶不要被野草覆盖掩埋，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直向后人诉说这段历史……”

本期，我们也梳理了一些美好的记忆：“百年沧桑”专栏文章中所描述的海南会馆及其相关人士，还真如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伊人”。那份对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坚守与执着，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另一篇文章所描述的主人翁，也会让我们肃然起敬。那就是坚守《赤道风》杂志33年的方然和芊华。“人物景点”是我们新推出的专栏，作者用平实的笔调，写出了平凡的两个人物。所不同的是，该文让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所描述的两主人翁，的确也在灯火阑珊处……

2018年·第1期·总期: 131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李国基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周兆呈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蔡成宗
李叶明 徐李颖

■总编辑■

谭瑞荣

■编辑/记者■

欧雅丽

■英文校对■

李国樑

■总代理兼发行■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

■设计、分色、承印■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5/02/2018

■出版■

2018年2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₆

- p.4 纵横南洋** 1942, 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李叶明
侵略与失败的象征——昭南神社 黄兰诗
日本731部队和新加坡 林少彬
- p.18 先贤后裔** 父子同心缔造书业传奇 莫美颜
——访周星衢之子周曾镠
- p.21 总会专递** 《新加坡华人通史》在中国出版 欧雅丽
心系新加坡 镜头传情意 欧雅丽
——第一届“心系新加坡”摄影比赛
千人同贺戊戌狗年 华社共聚庆祝新春 欧雅丽
- p.26 异族翘楚** 古典印度乐舞之家 吴明珠
——访新加坡印度艺术学校校长山卡·拉詹
- p.30 旧貌新颜** 加东文化之旅 李国樑





p.18 先贤后裔



p.26 异族翘楚



p.36 百年沧桑

- p.35 艺文脉动** 看得见的音乐 槐华
—— 吴耀基书法展
- p.36 百年沧桑** 众里寻他千百度 沈蕊蕊
—— 30年坚守文史哲讲座的海南会馆
- p.40 社团聚焦** 舌尖上的福州 俞玥
- p.42 杏坛岁月** 文字的臭虫 尤今
- p.44 建筑情缘** 牛车水骑楼风情 虎威
- p.46 华语华文** 走近跨越百年的智慧长者周有光 汪惠迪
——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60周年
- p.49 国际之窗** 专访古筝演奏家李坤 陈梓欣
- p.50 艺术长廊**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艺术追求 邹璐
- p.54 人物景点** 《赤道风》33年 林高
- p.58 学海拾珠** 新加坡华语的国际定位 新沼雅代
- p.61 本土文学** 一个人的加冷河畔 齐亚蓉

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文·李叶明

76年前华人新年的大年初一，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黑暗的日本占领时期就此开始。

今年的2月15日，适逢农历大年三十，又是华人庆祝传统农历新年的一个重要日子。而2月15日这一天，早已被新加坡政府定为“全面防卫日(Total Defence Day)”，以提醒国人永远不能忘记居安思危、保家卫国。

在华人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别采访了三位经历过当年战争的老人家，通过他们的回忆来让我们了解，当年新加坡沦陷及日本占领时期，人民的遭遇和当时的生活状况。



回忆当时的生活，苏晋兴老人只说：“给日本人统治过，你才知道有多么辛苦！”

油池火光冲天

苏晋兴，1927年11月生于福建安溪。1937年随母亲来到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当时他们住在武吉知马路上段俗称14英里的一个甘榜，大家把这里称为“油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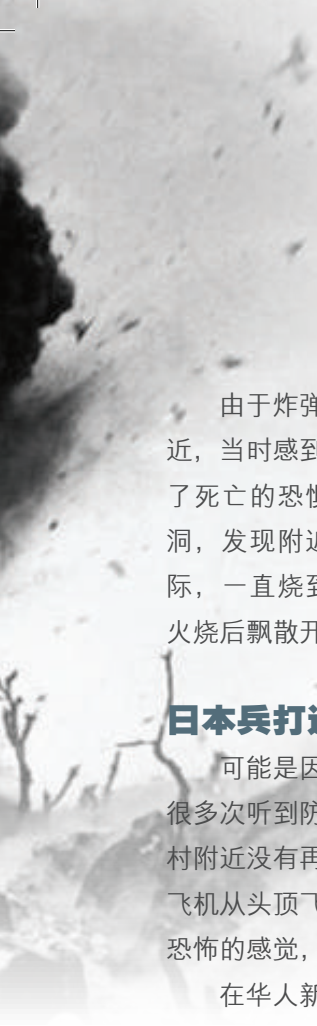
村”。之所以叫“油池”，是因为附近有英国人的储油库。

据91岁的苏晋兴回忆，当时在甘榜附近能看到30-40座大大的圆桶形状的白色储油库。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储油库显然成为日军第一波大规模轰炸的目标。

在战争爆发前，新加坡其实已处在战争阴云之中。苏晋兴记得，当时殖民地政府通过报纸刊登通知，要求居民挖防空洞。警察也在村里挨家挨户登门，教居民如何挖防空洞，做好应对空袭的准备。

苏晋兴家挖的“防空洞”离住处不远，就在屋后一片小树林中。这个可以容纳全家人的“防空洞”，其实并不坚固。顶部只是用树干支撑，盖上木板、亚答叶和泥土，根本无法抵抗炸弹爆炸的威力。

苏晋兴老人清楚记得，1941年12月8日凌晨，第一波大规模轰炸开始。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一家人赶紧躲进防空洞，就听到飞机声，接着就是炸弹的爆炸声。



由于炸弹就落在附近英军的储油库，离他们非常靠近，当时感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简陋的防空洞里充满了死亡的恐惧。终于大轰炸过去了，当他们走出防空洞，发现附近英军的储油库火光冲天。大火映红了天际，一直烧到天亮。空气中除了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火烧后飘散开的余烬，几乎把整个甘榜染成了黑色。

日本兵打过来了！

可能是因为储油库在第一波轰炸中尽数被毁，之后很多次听到防空警报，很多次跑进“防空洞”，但油池村附近没有再落过炸弹。苏晋兴告诉笔者，后来都是听飞机从头顶飞过，然后从市区方向传来爆炸声。可那种恐怖的感觉，一点也不会少。

在华人新年前夕，日军从新山方向打了过来。油池村正处在日军的进攻路线上。村民们纷纷逃离甘榜，躲避战火。苏晋兴一家决定分开逃亡：母亲带着大哥他们；父亲带着自己分头躲避日军进攻的炮火。

到2月13日，油池附近的枪炮声渐渐平息，战线向市区方向的11英里处推进。苏晋兴一家重新团聚时，才得知噩耗，跟母亲一起逃亡的大哥，被日军炮火炸死。油池村当时满目疮痍，日军曾进村烧杀奸淫。苏晋兴说，邻居家一名14岁大的童养媳，就被几个日本兵给轮奸了。

之后没多久，消息传来，英军向日军投降。当时正是华人新年的大年初一。紧接着大检证开始了。日本兵把成年男性都赶到一个地方集中。苏晋兴当时年纪还小，没有被赶去集中。事后听说，日本兵把看上去斯斯文文、像是知识分子或当过老师的都抓走了，从此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战前，南侨总会曾经发动抗日捐款。苏晋兴记得，当时福建籍侨领黄奕欢、侯西反等人曾到油池村来演讲。村里的人虽然不富裕，但还是有不少人用5分、1毛钱买花支持抗战。当时能够捐出几块钱的就是“大数目”了，会得到一张正式收据。到日本兵来油池村检证时，大家知道这种收据千万不能留，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全都销毁了。

悲惨的澳洲战俘

大检证过后，日本人建立起保甲长制度，并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维持治安。当时听进城的村民描述，有盗贼被日本人抓到后砍下脑袋，挂在纽顿交通圈那边示众。这让苏晋兴这些孩子们听得毛骨悚然。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油池附近除了偶尔看到日本宪兵，一般很少能见到大队日本兵。但是每天村民们都能看到大队澳洲战俘从武吉知马路走过。这些战俘是被押去11英里那边的小山修忠灵塔。

苏晋兴说，这个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修通往山上的公路、高高的台阶，然后修纪念日本阵亡将士的忠灵塔，这些全都靠人力，所以修建速度并不快。而且这些战俘住在克兰芝旧兵营，后来被当成战俘营，现在则是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墓。从那里走到施工地点，要走好几英里的路。

这些战俘在日本兵的押送下，每天早上走去开工，傍晚走回战俘营。刚开始，战俘们列队还算整齐，军装看上去还很新，人也比较精神。但是几个月过后，他们开始变得衣衫褴褛，有些人已经不穿军服了，人看上去脏兮兮的，有的已经骨瘦如柴，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出什么队形。

苏晋兴听村里人讲，这些战俘被虐待，吃不饱，生了病也没人管。战俘营里经常有人饿死病死，就在附近草草一埋了事。所以每天列队去修忠灵塔的澳洲战俘，一年后明显少了很多。

其实，村民们的生活当时也很艰难。日本占领时期，对米粮进行管制，配给的定额根本不够吃。还好村民可以在住家附近种木薯充饥。苏晋兴家在战前经营杂货铺，日本占领后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卖。唯一能进货的地方是美芝路的“铁巴刹”，能进的不过是一些鱼干、绿豆、花生米之类的货品。

当时缺衣少药，生了病也没地方看。如果看中医，拿了药方也没地方抓药。学校和社团全都被关，孩子们没地方读书。1943年，苏晋兴的父亲只是因为“热病”，也就是中暑，由于没有药、身体弱，就这么去世了。全家人靠母亲和当时刚年满20的二哥，苦苦撑到战

争结束。回忆当时的生活，苏晋兴老人只说了一句：“给日本人统治过你才知道有多么辛苦！”



大士村被疏散

罗沿龙，1931年6月生于文礼一带的树胶园，父亲当时是杂工，他出生的地方称为“浙江园”。当时附近有好些地方都用中国地名来命名，如成都园、云南园等等。

罗沿龙出生后不久，家里就搬去大士16英里-18英里新开辟的村落。据87岁的罗沿龙回忆，当时村里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福建人以务农、种菜为主，潮州人则以捕鱼为主。当时海里的鱼很多，渔民的生活比较好过，他们务农的则相对辛苦些。不过村民们都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生活还是很愉快的。

起初，大士村一带完全没有学校，也没有诊疗室。后来当地先贤集资办起了公立裕群学校。当时所谓“公立”，并不是政府办的意思，而是与私人办校相对，是指由众人出资办校，学校不属于一个人。

罗沿龙当时在裕群学校读到四年级。1941年12月，学校刚放假不久，战争就爆发了。罗沿龙回忆道，当时日本飞机丢炸弹，除了坡底(市区)被炸，离大士不远的蔡厝港附近的机场也被炸。凄厉的警报声，巨大的爆炸声，搞得人心惶惶。没过多久，大士村民就接到英军下的疏散令。因为大士附近有两座英军炮台。而大士村的

一部分居民住在柔佛海峡岸边，听说日军已打到柔佛海峡对岸。大士已经成为抗击日军登陆的最前沿。

罗沿龙一家十口，有父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老大。当时在匆忙的疏散中，他们只卷了几套简单的衣物就离开家园，撤到了武吉巴督一带。父母在那里租了一处简陋的地方暂时住下。后来罗沿龙才知道，他们租住的那个小小的亚答屋，原本是一处鸡寮。

日军闯进甘榜行凶

2月8日，日军开始登陆。2月10日，已经有日本兵下到武吉知马一带。听说日本兵是从林厝港那边打过来的。当时罗沿龙在武吉巴督能听到四周密集的枪炮声。再过两天，裕廊一带平息下来。附近看不到英国或澳洲兵了，反而有日本兵开始三三两两闯进甘榜抢东西。

罗沿龙一家早就听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所以看到日本兵抢东西，也敢怒而不敢言。村里的女孩当时都换上男孩的衣服，用锅底的灰把脸上抹黑。但还是有被日本兵看破的，有村民就看到一个女孩被日本兵光天化日下强奸，然后杀死在路边。

罗沿龙的大姐在战前已经出嫁。当时父母最担心的是二姐，她的年龄谈婚论嫁似乎有些早，但小女生落到日本兵手里，恐怕更不好。父母越想越怕，就随便找了一户人家草草把二姐嫁了出去。罗沿龙听说，那个男的在中国有原配。战争结束后，原配还找来新加坡，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当时在武吉巴督，有一家从坡底来避难的大户人家，家里有一位千金小姐，人长得很美。有一天日本兵进村，正好撞上这个女孩。罗沿龙说，自己当时是孩子，吓得只是站在原地看。那女孩胆子很大，以为自己穿男孩衣服，脸上涂黑，日本兵看不出来。结果那日本兵叫住她，并一把从身后把她抱住，吓得女孩大声尖叫，一下子就露馅了。

不过女孩发疯似的挣脱日本兵，转身跳进旁边的萍池中。所谓萍池，就是长满浮萍的水塘。罗沿龙说，当时很多甘榜都有这种水塘，村民会来这里捞浮萍喂猪。水塘不会深，里面的水很臭。女孩跳进萍池，日本兵不愿下水去抓，于是在岸上拉枪栓吓唬女孩，让她上来。

可女孩宁死不肯上岸。就在这时候，不知其他日本兵发现了什么，一声招呼，全离开了。女孩这才躲过一劫。

日本兵除了抢掠、强奸，还抓人。罗沿龙一个伯父叫罗端狮，跟另一位同族罗朝图，在同一天被日本兵抓走。武吉巴督已经不安全了。父母决定回大士家中。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更是触目惊心。在12英里醒南学校附近，他们看到日本兵在抓人、烧尸体。路过当时的陈远清砖厂时，他们看到不少死难者，其中就有自己的一位姑丈。

大检证，校长被杀

在罗沿龙的记忆中，肃清和检证从日本兵一占领就开始了，大士一带的检证比市区早。罗沿龙一家2月14日回到自己家中。当晚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就把养的猪拉出来杀掉，一来准备过年，二来担心会被日本兵抢走。

当晚听说英军投降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2月15日)，突然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进村，赶人到裕群学校集中。由于当时大士村范围很大，日本兵一直从早上赶到傍晚，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罗沿龙当年11岁，

因此没有被叫去检证。听回来的人说，通过检证的人会被分成两边，一边被放回家，另一边的人上了卡车，从此不知去向。

当时有一个村民和刚成年的儿子一起去检证，儿子原本被分到要放的那边，老爸去了另一边。老爸于是跟日本兵说，自己的儿子在那边，意思是能不能让自己也过去。结果日本兵却把他儿子叫了过来，父子俩一起被押上车。他们成了大士村同时遇难的一对父子。

在遇难的人中，还有裕群学校的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罗沿龙非常怀念陈荫庭校长。他是一位在村民中威望极高、治校有方的校长。1934年，裕群学校创立之初，用一间店屋作临时校舍，两年后就建起了正式校舍，地点在如今裕群地铁站附近。当时从7英里往上到18英里，共有10间学校，其中数裕群和树群两校学生很多、教学也最好。到战争爆发前，裕群学校已毕业近百人。

陈荫庭校长一开始对师生参与政治活动很反对。但到了1938年，新加坡支持中国抗战的各种活动越来越多，陈校长也不再阻止，而是允许老师在学校教唱抗日



1942年2月15日，以陆军中将白思华(右一)为代表的团队，从武吉知马路走到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图片来源:《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8月)

歌曲，如《锄头歌》、《大刀进行曲》等，也允许在学校组织抗日筹款义卖会。

罗沿龙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名抗日分子叫陈油，曾带着几个学生去坡底参加抗日群众大会，罗沿龙是其中之一。去的时候大家很兴奋，但回来后听说陈校长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些学生不来上课？还说要亲自严查此事。陈校长治校素来严格，他曾经公开鞭打一名顶撞老师的男生，当时罗沿龙听说校长要严查，心里怕极了。但后来校长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处罚。

由于开战时学校正好放假，只有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住在学校。刘老师50多岁，个子矮矮，有些驼背。他和陈校长一起在检证中被杀。陈校长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之后突然不知去向。检证过后，日本兵用铁链绑住校舍的柱子，用军用卡车一下子就把裕群的校舍拉垮了。此后三年多，罗沿龙他们再也没有读过书。

打耳光、采椰子

陈校长和刘老师被杀，令大家痛心疾首。裕群学校的几位董事，还有大士村的一些村民也被杀。罗沿龙老人特别整理了一份名单，希望后人不要忘记。

进入日本占领时期，日军对粮食进行管控，并在大士建立起收集站。大士村出产的所有农产品，大士码头的所有渔获，都不准私下买卖，需全部交到收集站。日本人还给每户发了户口登记证，按人头规定最低产量，如果产量不达标，就会被抓去做“奉侍队”，也就是给日军做免费苦力，去修工事等。

罗沿龙回忆，那几年幸好产量不错，除了种米，他们也种木薯，解决了不少问题。在那个时候当农民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吃饱。而大士村的渔民就不够吃了。因为渔获统统要上交，粮食却是配给的。在树胶园里做胶工的马来和印度同胞也是如此，大多吃不饱。于是农民冒险私卖木薯给他们。

当时大士村附近原英军炮台驻扎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在兵营门口堆起沙包，架起机枪，每天都有人在外面站岗。按规定，新加坡人路过日本兵营的岗哨，必须要向日本军人鞠躬。罗沿龙回忆说，当时有些日本兵很可恶，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故意转身假装看不到，然后就赏给你几个大耳光。

日本兵有时还闯到附近的村子来抓鸡、赶猪。一般鸡不太好抓，他们就命令村民去抓。有一次罗沿龙的父亲就被他们叫去抓鸡，结果抓不到，被日本兵暴打了一顿。当时村里的女孩都不敢大意，白天都躲进山芭里，父母会让男孩去送饭给她们，直到晚上天黑才敢回家。大家就这么提心吊胆过日子。

当时学校没有了，华文书也被日本人烧光。日本人开了日文学校，推行愚民政策，但是村里没有孩子去。那时华文报也都停刊了，村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家里的男孩都下地干活，有时日本兵会把男孩叫去，让他们爬树采椰子。有的孩子采了几个后，累了想下来休息，结果发现日本兵举着刺刀、刀尖向上戳着。他们吓得直好再往上爬，继续采。直到日本兵收集到足够的椰子后才扬长而去。

美国轰炸机来了！

虽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但是到1945年，天上开始出现美军的轰炸机。罗沿龙后来知道，那种机身庞大、飞得很高的轰炸机叫B29。当时防空警报一响，孩子们都会兴奋地跑出去看，有时还会跑到小山顶去看。当时大士一带有很多小山，后来都被移平，拿去填海了。

当年站在小山上观战，罗沿龙曾看到有日本飞机被打下来，一头栽进柔佛海峡里，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才从水中浮起来。军营里的日本兵有时会用机关枪对天空扫射。但B29的高度，用机关枪根本是打不到的。

B29每来一次，他们就知道日本人离战败不远了，但日本法西斯这时候也更加疯狂。有一次罗沿龙看到有4名英军战俘被押去挖战壕。B29飞来时，他们一时喜形于色，有人还拍起手来，结果一名日本军官当场就拔出枪，把他们都射死了。

后来村民听树胶园的印度工人说，当年大士村检证被日本兵抓走的人，都用电线绑住双手，被卡车载到成都园一带杀害。日本兵抓了印度人去埋尸体。那个地方后来成了日本投降后，用来关押日本战俘的地方。而成都园就在16英里，大体在如今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学院附近。罗沿龙说，南大那边的云南园，则是日军的另一个杀人地点。





父母是抗日分子

本地慈善家黄马加兰，1938年出生于怡保。战争爆发时，她才四岁，对当时日军南侵的印象不深。她只记得自己从小就被剪了短发，穿男孩子的衣服。一直到1947年，日本投降后两年，自己已经快十岁了，父母才允许她留起长发，穿回女孩子的衣服。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她跟姐姐出门的时候遇到飞机轰炸。当时炸弹从天上落下来，地动山摇一般，巨大的爆炸声令人感到异常恐惧。她跟着姐姐躲进路边别人的店屋里，爬在一张桌子下瑟瑟发抖。

怡保是马来半岛著名的山城，附近都是高山。在日本占领时期，怡保附近的山区一直有抗日军活动。黄马加兰记得，自己家有一张床特别高。当时父母不让她进那个房间。后来她才知道，原来父母是抗日分子，那张特别的床下藏着油印机，父亲会躲在那里印传单。印好的传单则由母亲运送到一个秘密地点。

今年80岁的黄马加兰告诉笔者，她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参加”运送传单的工作。她只记得那一次，母亲带她出门，照旧把她放在脚踏车后座绑着的一个篮子上。篮子里装的就是刚刚印好的传单。而她就坐在盖了一条花布的传单上面。可是没想到，这次在半路上遇到日本兵检查，母亲眼看情况不妙，一把将她抱下车，推

给旁边的路人，让她自己回家。

年幼的黄马加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日本兵拦下，他们搜出了传单，然后当街对母亲进行毒打。一名日本兵用军用皮鞋踩住母亲的胸口，那个场景给黄马加兰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母亲总是咳嗽，黄马加兰一直认为，是被那名日本兵用大皮鞋踩伤的原因。母亲那么美丽、优雅的一位少妇，居然被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

在狱中感染肺病

黄马加兰回忆说，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家是做贸易的，俗称“九八行”。有三间店屋，下面用来做生意，上面住人。战争爆发后，贸易难做，店里的货物还被日本兵抢，损失惨重。当时家中米粮已经不够吃，这时邻居来借米，母亲毅然决然地借给了他们，并且安慰孩子们说：“我们不会饿死的，我们可以吃木薯。”她告诉孩子们，邻居家比我们困难，已经断粮很久了。

母亲第一次被抓后，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被放了出来。但很快母亲再一次被抓，父亲也被抓起来，而且音讯全无。一直到战后他们才知道，父亲后来逃了出去。母亲则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和折磨。好在当时离日本投降不远了。日本投降后，母亲被放了回来。这时她身上遍体鳞伤，而且一直在咳嗽。

在父母同时被抓时，家里一度陷入困境。几个兄弟姐妹是靠两位奶妈照顾，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妈妈回来后，很快他们发现，每次吃饭，母亲都不跟他们一起吃，而是远远在一个角落独自一个人吃。平时她还用手巾包住口鼻，别人跟她说话也会离得远远的。后来听奶妈讲，母亲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病。这种病是传染的，当时夺走过很多人的性命。

不过母亲很坚强，也很乐观。她除了定时去看医生，按时吃药，也开始打太极，调养自己的身体。而战后的医疗条件开始恢复，母亲的肺病终于得到控制，最后完全治愈。但是她在日本监狱里留下的那一身伤痛，一直没有彻底痊愈。

（作者为本刊编委、《随笔南洋》主编）

纵横南洋。

侵略与失败的象征

昭南神社

1942年2月日军参拜昭南神社。
(图片来源:《戦前シンガポールの日本人社会:写真と記録》シンガポール日本人会, 2004年)

战俘在神桥边劳动。(图片来源:《写真周报》日本情報局编辑出版, 第235号, 1942年)

神社“后殿”(图片来源:《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1984年10月)



山道前的鸟居, 背景为神桥(图片来源:《アジア遊学》, 大澤広嗣“昭南神社 - 創建から終焉まで”, 勉誠出版, 2009年)



文·黄兰诗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马来战役, 次年2月15日英军投降, 日军在新加坡岛上升起日章旗, 与此同时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昭南”在日语中有南方之光的意思, 而对于新加坡的民众来说, 日据时期却是一段异常黑暗苦难的日子。

获胜的日军为了感谢“神明”的保佑, 决定在本地建“昭南神社”来供奉日本的“神明”。所谓“神社”是日本人崇奉与祭祀神道教中各神灵之处。二战结束时, 日本人在海外建立的神社达1640座, “昭南神社”便是其中之一。

其实, 在建造“昭南神社”之前, 本地已经有一座日本神社, 并且名称也很接近,



供奉天照大神的“本殿”（正殿）（图片来源：《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

曰“昭南神社”。此神社坐落于新加坡埠北部五哩半处的树胶园中，俗称“大神宫”，1922年2月由在本地经营橡胶园的日本人大平源四在自家园内所建，是本地日本侨民逢年过节参拜的“圣地”。太平洋战争前神社由永福虎主持，日军入侵新加坡期间，神社及其供奉的“御神体”（即象征神灵之物）、“御写真”（当时天皇的照片）在炮火下得以侥幸残存下来，曾被日军暂时保管至昭南警备司令部三楼。

虽然已经有现成的神社，日军士兵也前往参拜，但军方仍希望建造更有“神威”的神社。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昭南日报》上宣布，将兴建“昭南神社”以祭祀“天照大神”，作为“大日本帝国之光荣纪念”。“天照大神”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神灵，太阳的化身，被奉为天皇的始祖，也是日本原始宗教神道的最高神。显然，日军将胜利归功于日本的最高神灵，并且选择其充当“昭南岛”的守护神。

祭祀“天照大神”在日本古代就已经盛行。现三重县历史悠久的“伊势神宫”便是供奉祭祀“天照大神”的总社。如前所述，天照大神为皇室氏神，故该神社历史上与皇室、朝廷的权威紧密联系。明治维新后，随着对天皇的神化和军国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等宣传甚嚣尘上，伊势神宫香火兴旺，“神明”成为军国主义者利用的宣传工具。

日军是以“解放者”自居占领马来的，“太阳旗”覆盖下的马来，“自然”已经沐浴在“太阳”的“荣光”之下，供奉天照大神，并且将神社冠名为“昭南神社”，其寓意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岛”高度一致。

既然供奉的是“天照大神”，军方一开始就对神社定位极高。当时东南亚各地已经建有一些日本神社，还有一些待建，军方则将昭南神社定位为整个南方“共荣圈”的中心神社。经过精挑细选，日军看中了新加坡岛中南部麦里芝蓄水池一带。此地山环水绕，景色秀丽，

日军认为地形与伊势神宫所在地十分相似，决定于蓄水池北岸的155高地建造神社，并且以神社为中心，划定土地面积十万坪(1坪合3.3057平方米)为“内苑”，将水池南岸的高尔夫球场、赛马场一带150万坪划定为“外苑”，用于各种设施的建设。

1942年3月初准备工作开始。据《昭南日报》3月8日报道，日军衡山部队长率领其部下将兵及俘虏一万人进入现场施工。同月30日神社正式动工，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司令官亲自主持奠基仪式。工程分两期，第一期是建神桥、“鸟居”(类似牌坊)，为神殿打基础、建构架。第二期是完成所有工程，包括神殿、外苑、参道的建设。为了在短期内完成这一“宏大”工程，军方倾注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在劳力方面，日军除了动用自己的工程兵外，还使用了大量战俘与本地工匠。按照日方统计，神社至竣工所用的劳力按日计算达35万人次，其中日军18,681人次，战俘330,633人次，本地工匠等700人次。工程规模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物力方面，军方也是不遗余力。使用的木材达4,500吨，石材350立方米，水泥13,100袋。为了符合神社的定位，日军对建材用料甚为讲究。例如，木材选自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森林中的“龙脑树”。这种树高可达五、六十米，直径有一、两米，是高大建筑的最佳选材。此外，日军还特地从日本运来日式建筑常用的桧树木材，从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日据台湾阿里山运来桧树皮铺盖神殿屋顶——这是日本神社建筑的特征之一。由蓄水池岸边通往高地的石级，石料则选自乌敏岛(Pulau Ubin)。至工程竣工，共耗资约100万日元。如何估算这100万元的价值？当时在日本刚刚上任的小学教师月薪为五、六十日元，100日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多万日元，由此就可以知道日方在神社上耗费的财力了。

在如此总动员下，神社建设速度很快，7月就完成了一期工程。同月30日，日军举行了神桥开通和神社上梁仪式，参加者有军司令官、参谋长、昭南特别市事业部长纲田德氏和军政长官及将兵等数百人。众人先到神桥头一字形排列，两位神官手执素幡、青草树叶之类，行降神、昇神之仪，献上祝词等，然后由神官先导，挨次踏上神桥，过桥之后，沿着百级石阶，分三段而上，登上二百余尺高的山顶。山顶为平地，是神社主体建筑所在

地，山顶北面为神社之殿，已具规模，石柱木栋已立，神殿角上竖有帜幡宝镜弓箭，殿上祭坛处则排列时果素食、宝镜贡盘等物，殿前左右两旁则竖有五色旗幡。

1942年末，二期工程完成。建成后的神社由开放式结构的“拜殿”、“中门”、“祝词舍”、供奉天照大神的“正殿”、“后殿”、三座高大的鸟居、约120米长的“神桥”、“战胜纪念馆”等组成。从参道远眺，青山高耸，苍松叠翠，池水环绕，红桥倒映，景致之优美不逊色于日本国内其他神社，与南方“共荣圈”中心神社的地位完全吻合。为了庆祝这一“伟大”工程的竣工，日本当局当年还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

1943年2月15日，是日本占领新加坡一周年纪念日，即新加坡沦陷的第二年，日方进行了昭南神社落成典礼——“镇座祭”。根据当初计划，祭主应为南方军总司令官，可能是战局吃紧，总司令官无法脱身，实际负责祭祀的是“昭南特别市长”大达茂雄。当天市长身着平安时代官服，陆海军将领则组成仪仗队全副戎装出席。除了新闻记者外，本地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也被要求派代表参加观礼。自此至战败，神社每年2月15日都例行大祭。除此之外，还有祈年祭(2月17日)、新尝祭(11月23日)日本两大传统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

在战争日益吃紧、财力和人力紧缺的状况下，日军耗费巨大物力人力建造神社，至少有两个目的。

其一，为在马来等地作战的日军及其侨民建立精神支柱。日军深受军国主义教育，能使他们远离故土参拜供奉“万世一系”之源的“天照大神”神社，无疑能进一步激励军心，鼓励士气。日军在南方占领地，不是这里建塔便是那里立碑，神社建得不少，但由于经费等问题，建的神社规模都很小，有的仅仅相当于“遥拜所”程度。新加坡是日军“南进”的最大军事基地，南下北上的日军都要经过此地，集中力量在此建成南方“共荣圈”的中心神社，自然最具代表性，影响重大。规模大地位高的“昭南神社”的建立，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依托。

根据日军的后续计划，神社周边还将建立公园、运动场及游泳池，增建野宴之地以及划舟之湖，供昭南市集会，或举办东亚运动大会。显然，日军的最终目的是以神社为核心，将这一带建成南方日本军民的精神家园。



1943年2月15日落成典礼—“镇座祭”（图片来源：《写真周报》日本情报局编辑出版，第264号，1943年）

其二，以神社为工具强化对本地人的精神统治。日军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意思是让“天照大神”照耀南方大地。然而，占领只是军事上的胜利，与此相比，征服人心更难，也更重要。日军虽然自称“解放者”，但无法真正赢得人心，为了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日军采取了很多措施。神社的建立可以说为达到以上目的找到了一个重要工具。比如，大规模组织本地人(包括各界名人)参拜，尤其是组织学生定期参拜，潜移默化之下要达到同化的目的不是没有可能的。在此，神社成为实现精神统治的最好媒介。

不过，虽然有“美好”的愿望，却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月25日，日军炸毁神社，摧毁建筑，将神社供奉的“御神体”（神道不铸神像，使用各种物件作为神灵依附的象征加以崇拜）镜子和神刀抛入了南海。日军亲自炸毁昭南神社，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英军是不会留下这个“败战”的标志，与其落在敌人手里受辱不如先下手为强，以武士道精神败者自毁。至此，这一侵略战争的产物也随着日军的战败而灰飞烟灭。

如前所述，日军侵占新加坡后曾经将其定位为“南进”的最大基地，当时日本的报纸则将昭南神社定位为“昭南市”的守护神。然而，这守护神不仅守

护不了“昭南”，连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诚然，无论有何路“神明”守护，不义之战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

2002年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将昭南神社列为历史遗迹，周边则是户外休闲圣地麦里芝蓄水池公园。沧海桑田，时间的历史长河，已经带走很多东西，冲淡了太多的记忆。如今，只有通过当年遗留下来的石阶等，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史迹”的真实存在。但愿这些历史的见证——石级不要被野草覆盖掩埋，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直向后人诉说这段历史。更希望正义、和平之光普照世界，昭示、照耀未来。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华文义务导览员）

资料来源：

1. “昭南神社及忠霊塔関係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档案，编号：南西-軍政-27(1942-1943)
2. 《写真周报》日本情报局编辑出版，第235号、第264号，1942年
3. 《昭南日报》昭和17年3月3日、3月8日、7月31日
4. 《联合早报》，黄彬华“昭南神社、忠灵塔今安在？”1988年1月17日
5. 《联合晚报》，史马“一社二碑今何在？”1988年4月24日
6. 《アジア遊学》，大澤広嗣“昭南神社—創建から終焉まで”，勉诚出版，2009年
7.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

日本731部队和新加坡



文图 · 林少彬

飞来的老鼠

1944年10月某日，日本皇军的三架97II式重型轰炸机从东京西郊的立川机场起飞，每架各载了5千只老鼠，轰隆隆地飞抵了新加坡(日据下的“昭南岛”)。几辆军车和几十名皇军，分成三路，把一批老鼠送往新加坡的中央医院，一批送往新山的淡杯精神医院，一批送往雪兰莪的瓜拉庇劳(Kuala Pilah)，再把剩下的一批用军机运往印尼的万隆。

1万5千只老鼠？它们飞来干什么？又是“谁”派这些老鼠来的呢？

原来，从1943年开始，皇军无论是在中国的主战场还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小战场，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里，处处挨打碰壁，整个战局已经转入败势。狗急跳墙之下，日军最高层决定使用杀手锏“鼠疫炸弹”来对付中美两军，启动了秘密的违反天良的“HO号作战”计划，下令731部队全力饲养老鼠和鼠蚤，从而生产出患上鼠疫的有毒鼠蚤，装填入弹，投掷中美敌区，人造鼠疫，进行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杀。

那么，731部队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臭名昭彰的杀人恶魔731部队(石井四郎军医少将领导)早已在中国的哈尔滨研究了好几年的鼠疫杀人方法，并且已经分别在中国几个市镇，用军机低空投下实弹，对毒鼠蚤弹的杀人效果取得了“满意的成绩”。然而中国东北寒冷，日军研究得到：“饲养繁殖鼠蚤的最佳气候条件是：摄氏22度和湿度76%。鼠蚤在夏天能活

20到30天，而在秋天则只有15到20天。”地球上最为吻合这个气候条件的，正是又有树胶又有锡矿的东南亚！因此，只要日军一占领了东南亚，731部队马上就要在新马一带大搞鼠蚤繁殖和生产细菌武器！

果然，山下奉文一打到裕廊，新加坡还未沦陷的2月12日，731部队的先头部队就上来了。结果他们选上了中央医院西面的“英皇爱德华7世医药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现在的卫生部医学院大楼)，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的2月底就设立了731部队在东南亚的总部，称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防谍编号是“冈9420”，部队长是北川正隆(军医大佐)，总务部长竟然由石井四郎的左右手之一的内藤良一(军医少佐)亲临执刀。内藤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掌握了冻结和干燥血液的技术，而且精通英语。

日军占用了这座大楼和它后头的陈德源大楼搞细菌研究，还有附近的山坡和草地，饲养了少数目的小马、白鼠、兔子和驴(印尼产)等。

3月头，日军跨过柔佛海峡占领了拥有635英亩土地的新山西北郊区的淡杯精神医院(Tampoi Mental Hospital)，并且以杀鸡儆猴的方式“血祭”了两名医生，然后把医院改装成能够大规模饲养老鼠和生产细菌武器的工厂。

以新加坡为总部的细菌武器制造部队

笔者幸运地挖掘到了7名前冈9420部队队员的口述



笔者在当年的冈9420部队总部大楼前展示相关资料

历史档案、回忆录、访谈录等，再加上日本出版的证言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之后，得出这个秘密组织的轮廓：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营运总部，新山是细菌武器工厂。新加坡和新山是主从关系，是一条生产线，工厂“出货”到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运送去泰国。日本或中国的731部队上头送来人与物也先来到新加坡然后再赴目的地。

这个以新加坡为总部的9420部队是在中国大陆以外最大规模的731部队，主要有三大部门：

一个是统筹掌管“大南方”的各种行政和支援部门，如人事管理、会计、采购(军装配备、药品仪器)、物流运输等。队长是北川，总务部长内藤。

一个是负责研究和生产鼠疫菌、疟疾菌、破伤风菌和制造少量疫苗的细菌部队。以新加坡为基地的KONO部队主要是负责疟疾菌，而负责鼠疫菌的梅冈部队则驻守在新山。

最后一个是负责“安全和保障”新加坡水源不被“下毒”的检疫(科)部队。

根据日军的资料，冈9420总共拥有大约1000名工作人员。

那么，新加坡的731部队和中国731部队又是什么关系？在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各地还有731部队吗？

这里，就以笔者至今发现的史料，做个概述：

新加坡冈9420部队和“老板”以及“同僚”之间的关系：

· 731部队的最高统帅部门是在东京新宿的日本陆军军医学院防疫研究室或陆军防疫给水部。

· 中国大陆总部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外平房区的731部队。

· 平房其下有4个防疫给水部支部：(华北)北京的甲1855部队、(华中)南京的荣1644部队、(华南)广州的波8604部队和(南方军)新加坡的冈9420部队。

第二，新加坡的冈9420部队之下，有6个支部：马来亚支部、印尼支部、菲律宾支部、巴布亚新几内亚支部、泰国和缅甸支部(至今地点和作业不详)。

第三，在马来亚，有柔佛淡杯支部，简称“梅冈部队”，由大久保军医少佐带队，并设有三个分队：井村



当年的淡杯医院办公钟楼和入门处，依然竖立原处，不过这里已经再也不是精神医院，名称也被更换了



规模不小的淡杯医院，两端的距离约有1公里半左右(笔者摄于2016年2月)

队、中安队和江本队。

井村队由井村军医中尉带队，专门负责捕捉和饲养老鼠；而中安队(中安军医中尉)则负责在淡杯养殖鼠蚤和“研究”。井村队派了6名日军驻扎在雪兰莪的瓜拉庇劳(Kuala Pilah)，由大贝大尉带领，占用了东姑莫哈默中学(SMK Tuanku Muhammad)，雇佣了数十名马来人和华人来饲养整万只老鼠和上千只兔子。附近的皇家山旁还有一家由台湾人开的老鼠饲养场。井村队还另外派几名日军驻扎在仕拉央(Selayang)，任务内容不明。

江本队由陆军军医大尉江本修带队，是整个冈9420部队的核心——制造患上鼠疫跳蚤(毒蚤)，即制造毒菌武器的最关键的人物。

第四，在印尼，有椰加达支部和万隆支部。

第五，在菲律宾，有马尼拉支部，由帆刈喜四郎军医少佐担任支部长。

第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位于新不列颠岛东边的拉包尔(Rabaul)支部，和位于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支部，布因由森茂树军医中佐担任支部队长。在拉包尔，残暴的日军(平野英之助军医大尉)留下了使用美澳和新西兰战俘作人体实验的罪证(疟疾菌，1944-45年)，不仅让人们开始质疑，731部队从哈尔滨到南京都有干坏事，然后，跨洋过海到这个边远的地方再干坏事，怎么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会一点都不干呢？

那么，新加坡和HO号作战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HO作战中的“老二”

先说一说，什么是“HO号作战”计划。

根据日军史料的记载，“HO号作战”是在1943年4月展开的。731部队认真地研究大量运输老鼠的方法和死亡率，码头等候船只平均日数和所需鼠粮，等等。那时，广州的波8604部队提呈报告说，他们能够从1万只老鼠身上饲养出1公斤鼠蚤，再用这1公斤鼠蚤“人造”出

一定数量的患上鼠疫的“毒鼠蚤”。可是石井四郎并不满意，1944年4月在皇军陆军省局长会议中，石井说已经找到了每2500只老鼠制造出1公斤的毒鼠蚤的方法。

1944年7月以后，石井四郎少将时常参与讨论，提高制造毒鼠蚤产量的方法，以狗代鼠的方法，还有用毒鼠蚤武器攻击美国塞班岛的计划。甚至在“HO号作战”之外，还准备要用载上了毒鼠蚤的大气球计划，还有把毒鼠蚤撒到美国的圣地亚哥海军基地之类的“SE号作战”、“夜樱特攻队”等等。

有一天，冈9420部队接到了“为细菌战准备生产5吨毒鼠蚤”的秘密作战命令，瓜拉庇劳的中学草场上突然间囤积起了5万个石油桶！

紧急地从东京，而且动用轰炸机运送几万只老鼠过来新加坡，就是这样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的！

那么，新加坡的5吨毒鼠蚤在整个“HO号作战”之中，是个怎样的规模呢？

从一名日军军官留下的日记里发现到一则有关毒鼠蚤数量分配的记录：冈9420的“老板”即中国的关东军负责53%；新加坡负责14%；日本国内负责12%；广东的波8604负责5%；北京的甲1855负责3%；南京的荣1644负责1.5%。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冈9420在这个作战之中，高居“老二”，举足轻重。这就是新加坡沦陷成为“昭南岛”之后的命运。

幸运的是，老天有眼！皇军兵败如山倒，1945年5月冈9420部队接到“极秘命令”，挑选干部人员撤离退避到老挝去。6月15日先有80余名人员被撤到新加坡，接着24日，8辆军车载满了物资和档案离开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北上泰国，在8月某日抵达老挝的他曲(Thakhek)。在接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后，日军烧毁了所有的档案。从此，“南方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名字就消失在历史之中。

为何在日本投降后，731部队没有被问罪？

可是，您可能不禁要问：二战结束后，这些杀人魔部队成员没有被盟军清算吗？不是有个“东京审判”吗？

答案是，他们全体都被美军(不是盟军)赦免，无罪脱身。而且事后还变成了日本战后振兴医学界的砥柱和发展微生物医疗体制的功臣！



笔者采访前冈9420部队“第二研究班”的研究室助手陈杰佛瑞(91岁)

为什么？

原来，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美军一展开调查731部队罪证的时候，美国陆军化学战的Murray Sanders中校碰面的731干部不是别人，就是新加坡冈9420主脑内藤良一！内藤巧妙地以“庞大”的人体试验记录和8000片病理标本为“交换条件”，要求“赦免”石井以下的干部。这群恶魔最终在1947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元帅和美国政府的特赦令，不但无罪，还变成日本医学界的白衣天使，不是教授就是院长或社长。

笔者搜查曾是冈9420成员们的“发迹”记录，就查到以下5个真人真事：

内藤良一：利用他在731部队里头搞过的干血浆技术，1950年创办了日本血液银行，公司里的董事过半是前731部队成员。他并且利用美军在韩战中急需血浆的契机发了大财。1977年日本天皇还赐给他三等奖章。

大田黑猪一郎：内藤的绿十字公司的常务董事。

贵宝院秋雄：京都微生物研究院。

藤野恒三郎：大阪大学教授。

早川清：开设早川预防卫生研究所。

如果说，日据昭南时代是新加坡历史之中最悲的部分的话，冈9420部队的历史很可能是昭南时代之中最有毒的部分。

参考资料：

1. 奥斯曼曼口述历史档案(英国)，1982年
2. 竹花香逸著《蚤和鼠和鼠疫菌亲历记》(日本)，1991年
3. BBC中文网：《二战日军在东南亚也生产过细菌武器》，参见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140000/newsid_4142300/4142364.stm
4. 15年战争和日本医学医疗 第10卷第1号(日本)，2009年

(作者为日资跨国集团在亚太区的个人资讯保护官，业余研究和收藏太平洋战争日军史料，著书《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明治维新到战前》，本文的相关数据及资料属个人研究成果)



周曾铿近照

父子同心缔造书业传奇

访周星衢之子周曾铿



文图·莫美颜

在新马港三地为人熟知的大众书局成立已94年，创办人是周星衢(已故1905-1986)。在商言商，但他开书店不只是为了赚钱，还为了推广文化事业，而接手其业务的儿子周曾铿(80岁)跟他一样，经营书店既为了赚钱也执着于文化传承。

贵为南洋华文书业先驱的周星衢，祖籍浙江平湖乍浦。他出身贫寒，只受过三年正规教育，靠自修掌握华文和基本英文，辍学后在上海书店当学徒。1924年南来新加坡，创办正兴公司以销售书画、文房四宝为业。1934年，他顺应当时上海的白话文及标点书热潮创办了世界书局，1936年另设大众书局，开始涉足图书零售市场，以新加坡为据点，在吉隆坡、檳城、泗水等地发售华文书籍。1994年，世界书局并入大众书局，并发展为拥有众多分行的东南亚最大的连锁书店。

周星衢经营书局当然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但他同时也利用书店这个平台推动本地的华文、甚至是马来文的发展。

周星衢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说到父亲对文化事业的贡献，现为大众控股集团总裁的周曾铿认为，主要可分为四大块。

其一是设立大众图书馆。周曾铿说：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又会替人着想的人。那时图书很便宜，但仍有人买不起。为了提供力求上进者进修的机会，他于1936年6月成立“大众图书馆”。

据《南洋商报》报道，图书馆是周星衢的心血，他花费了许多精神、时间及物质来创办，还每月自掏腰包负担图书馆的开支。图书馆成立一年半后会员人数已达

千名。馆内的图书不断扩充，各地出版社也自动邮寄报章杂志，种类不下50种。

周曾镔说：“那时读书、买书的风气很盛，新书一到就被抢购一空。人人都要买书，不愿意借书，以致大众图书馆也难以维持下去。结果图书馆坚持到1946年便结束了。但在那个多事之秋，本地民众确实从中获益不浅。”

其二是重印中国旧版书籍，回销新加坡。1949年中国大陆成为“共产国家”后，新马当局对从中国输入本地的出版物更加严格管制，并颁布了禁书令，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58年10月22日，那次共有53家出版社被点名。

本地华文书局面临断货危机，周星衢突发奇想，向香港三联书局提出租借1949年以前，没有政治色彩的版本，例如文化、历史、地理、诗词曲赋拿到香港重印，销售新马。

周曾镔说，父亲的这一提议，不但解决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版物不能外销，新马华文书籍没书卖的问题，还使香港书籍出版业兴旺起来。这项合作直到1966年中国展开文化大革命后才告终。

其三是努力推广本土文化。随着整个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周星衢认为移居本地的中国人必须在此落叶生根，于是他便开始致力于推广本地文化，出版本土作家作品。

其中上世纪风行一时的《世界儿童》及《世界少年》，更是无数本地华文读者年少时的集体回忆。《世界儿童》于1950年4月创刊直到1978年停刊，这本专为南洋儿童量身打造的刊物，共发行了28年。《世界少年》则创刊于1952年，辟有“少年园地”供少年读者投稿。在1978年停刊前，还曾设立“世界少年清寒子弟助学金”，资助穷人家的孩子就学。

周星衢也效法上海的《小说月报》于1960年创办《南洋文艺》，以填补本地文学刊物的空缺。为了进一步培养南洋读者的“本土意识”，同年他又推出了《南洋文摘》。1962年至1965年期间周星衢再接再厉出版



周星衢

了方修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在本地出版物中还有轰动新马文坛的《马华新文学大系》

的面世。这部涵盖了1919年至1942年新马文坛主要事件和作品的巨著，被当时的《南洋商报》誉为“可媲美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为华文书局空前所仅有”。

周曾镔说，父亲不仅积极推动华文文化，在马来语文出版方面也非常尽力。他不只出版马来语词典，也出版马来连环图和《马来语月刊》。其中创刊于1960年共发行了11年的《马来语月刊》，是新马华人出版历时最久的马来语月刊，在推广本地马来文学习与文化交流上影响深远。

其四是栽培了不少书业人才。有人形容周星衢经营的世界书局就好像一个母体，人才辈出。本地有至少10家书局及10间学校的文具小卖部，还有出版社和印刷行是世界书局的前员工开设的。周曾镔说，可见父亲胸怀宽大。

不忘初心 默默耕耘

周星衢育有三子二女，周曾镔为三子。虽然周星衢大力推广华文，但他除了送两名长子进华校，

却让周曾锬和他的两名姐妹接受英文教育。周曾锬在加东一带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1964年在美国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周曾锬说，大学毕业后，他原想回到新加坡来，但父亲担心他年少气盛爱发表意见，不让他回来，而要他到香港管理书店业务。就这样，他落脚香港，在那里结婚生子。他的一子一女都是专业人士，目前有四个内外孙。

周曾锬坦言：“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经商，更没有想过要经营书店，而我念的是英校，对华文和华文书店非常陌生，起初真的很痛苦。”

他说：“幸亏那时仍是华文书业的黄金时期，只要新马有市场，香港的业务就不必太过担心，我跟着做就是了。”就这样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书局的业务。

书业在本地曾是个令人羡慕的行业，但80年代初情况开始变化。受新加坡教育政策改变的影响，华文书读者大幅减少，周曾锬也一度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为了力挽狂澜，周曾锬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双语书局”和“一站式”经营理念。

周曾锬说：“现在这个年代你不能只做书店生意，一定要多元化，我现在经营的书局仍以书籍、文具为主要业务，兼营生活文化产品，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比如我们卖食谱，食谱离不开烹饪，烹饪离不开炊具和餐具，所以我们也卖锅子和碗盘。”

尽管面对重重困难，周曾锬并没忘记当年父亲经营华文书店的初衷，仍为推广文化默默耕耘。

铜臭多过书香？

2004年他以父亲之名成立了非营利文化机构“周星衢基金”，就是希望通过出版及主办文学性质的活动，延续父亲推广华文文化、教育及语言的理想。出版方面主要以中英文两种版本，重新出版世界书局一些绝版书籍。基金会的对象主要是幼龄儿童，以保证他们对华文的兴趣。除出版双语儿童书、培训义工到不同的图书馆或学校给儿童讲故事，基金会也举办中小學生书法比赛，并与国家图书馆签订协议，定于2016至2021年间捐赠淡滨尼区域图书馆5万6000本华文儿童图书。基金会也办文学讲座、文化展览等活动。

2006年大众书局也开始举办“年度海外华文书市”。书市每年分别在新马港三地举行，这不只是大众书局零售业务的延伸，每年还设定不同主题，以推广华文文化及阅读为目的，并引进优质华文文学作品。

2016年在本地推出的海外华文书市，还首次在新加坡举办双语文化展览——“字在人家”。展览以四合院为架构，呈现汉字的日常面貌与“非常”特色。现场还辟设“墨池”，让公众在池边临帖《三字经》。

大众书局于1984年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那里的年度海外华文书市，除主打中英文书籍外，也加入马来文，三语策略成功吸引了大批马来族顾客。2016年的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还凭“最大规模书展”的殊荣被收录在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中。

2011年在香港办的海外华文书市让公众免费入场，成了香港首个免付入门费的大型书市。该次书市展销超过百万本中外书籍，还举行了百余场著名作家的讲座和签名会。

据知，周星衢基金是周曾锬用自己的钱维持的，至今投入的资金已超过500万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项目资金。海外华文书市一样赔钱，最初几年还蒙受巨额亏损。

周曾锬说，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并说自己铜臭多过书香。他很清楚，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在本地凡是冠上“华文”二字的生意都是不赚钱的；他也很明白，他推广华文的努力就像大海的一滴水，不管他付出多少心血，对前途暗淡的华文书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爱开玩笑的周曾锬经常“语出惊人”，问他为何还如此坚持华文文化和教育的推广工作？他说：“因为有一个傻父亲，所以有一个傻儿子。”其实周曾锬心里非常明白，正如他说的：“这很简单，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原来那是一种追寻自己文化与民族根源的执着使然。

周曾锬掌管的大众控股集团，业务主要分成零售、出版和房地产三大块。作为集团的领军人物，周曾锬从不言休，仍然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忙。他闲暇要么逛逛大众书局，要么带上行囊到人烟罕至的偏远地方放空自己，然后与友人合作出版旅游摄影集，与好友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新加坡华人通史》在中国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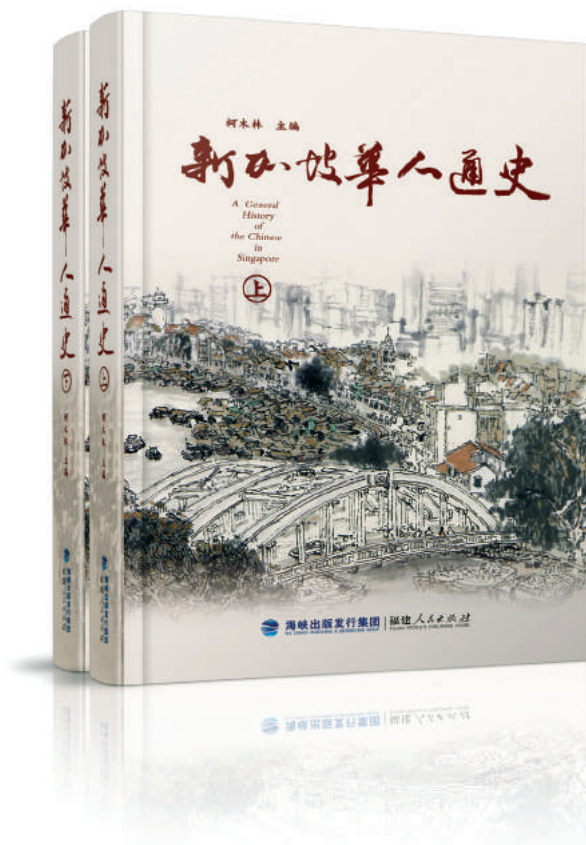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新加坡华人通史》于2017年12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引进,在中国出版。这本史册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为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的献礼。该书在2015年11月9日宗乡总会举行的成立30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上,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发布,李总理称它为“献给华社的一份珍贵礼物”。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我国首部中文版华人通史,内容涵盖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包括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人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等。该书聚集了海内外37位学者撰写,历时三年半完成,全书共分为18章41节,字数超过80万字。此书一经推出,备受好评。

据主编柯木林介绍,《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后,先后有多家中国出版社与宗乡总会联系洽谈购买版权事宜,最后决定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是中国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一直保持上乘水准,在业界和读者心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效率高,服务好,海外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由他们出版,质量受保证的同时也能吸引更多读者;另一方面,福建是东南亚侨乡重镇,很多新加坡华人先辈都是从福建南来,因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在文化上有一脉相承的意义。



与新加坡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不同,中国版不再是大型的单行本,而是分为上下两册,总页数超过1000页。中国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新设计排版,内容与本地版的一致。首印1000本,主要供研究新加坡历史、华人华侨的专家学者参考阅读。

柯木林说,从历史上看,新加坡华人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新中两国社会环境、教育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新加坡华人又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因为这些差异而需要相互磨合。希望这本书能使中国的读者更了解新加坡,并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心系新加坡 镜头传情意

第一届“心系新加坡”摄影比赛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首届“心系新加坡”摄影比赛于2018年1月5日晚上揭晓成绩，24张摄影作品从600多张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近150位嘉宾出席了当晚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The Pod)举办的颁奖典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也以主宾的身份，参与其盛。

三大主题展现精彩纷呈的新加坡

“心系新加坡”摄影比赛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主办，三江会馆、新加坡厦门公会和新加坡南安会馆协办，活动也获得了新加坡摄影学会和国民融合理事会的支持。

此次摄影比赛设有三组类别，分别为“心系中华文化”、“心系多元文化”及“心系特选系列—胡姬

花”，目的是鼓励公众透过摄影镜头，记录华族文化以及捕捉新加坡的多元社会风貌。比赛开放给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加。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周兆呈在颁奖典礼上致词。他表示，此项活动展开后即引起了热烈回响。大赛收到了超过600张参赛作品，参赛者的年龄最年轻的只有14岁，最年长的已经81岁高龄，当中不乏友族同胞及外籍人士参与。这足以证明参赛者对新加坡的情感是不受族群、背景、年龄等所牵制的。

马炎庆政务次长也肯定了此次大赛的意义。他认为此次摄影比赛展出的照片凸显了新加坡的独特文化，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新加坡的点滴，深入挖掘我国丰富的文化宝库。“心系中华文化”及“心系多元文化”更是体现了我国多元文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118张入围作品兼具艺术性与想象力

本次比赛特邀新加坡摄影协会会长吴金辉、前联合晚报摄影主任吴庆顺、前新加坡影艺研究会国际交流主任李海宝、新加坡彩色摄影学会会长吴伟承、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委员暨更生美术研究会名誉会长黄诗评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们从600多张参赛作品中选出118张入围作品，最后再评选出各组别的一、二、三等奖及5个优秀奖，共24个获奖作品。

摄影爱好者郑添辉摄于东海岸的一张捕捉九黄信徒《恭送九黄大帝回銮》的照片，夺得了“心系中华文化”组别的一等奖。该组别二等奖获奖作品是徐锦福的《轮椅上的三步一叩》(3 Steps I Bow on Wheel Chair)，三等奖的获得作品是许良成的《拜七月》。

“心系多元文化”组别，一等奖由陈福祥获得，他的摄影作品《端午传友情》，反映了华族端午节时，友族同胞与华族共聚学习裹粽子的场景，体现种族和谐。Jez Shi Siew Luan的《华文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 则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为白松山的《Shower of Blessings》。

“心系特选系列一胡姬花”中，王泽保在滨海湾公园发现了胡姬花令人惊艳的一幕，他的作品《Orchids and more orchids》获得该组别一等奖。蔡炎成的《Pretty in Pink》获得二等奖，胡美贞的《婀娜多姿》获得三等奖。

评审吴金辉在对本次参赛作品做点评时表示，众多

的作品当中都充分体现了摄影比赛的主旨，不仅凸显了新加坡的独特文化，参赛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想象力与艺术性也让人眼前一亮。

本届大赛也于1月6日及7日，在国家图书馆底层1楼展开为期2天的作品展览，展出118张入围及获奖作品。展出期间许多民众闻讯而来，欣赏本次摄影比赛的作品。

摄影工作坊捕捉文化心灵的瞬间

为配合此次摄影比赛，鼓励更多公众参与。主办方也于2017年9月3日上午在宗乡总会大巴窑会所举办“捕捉文化心灵的瞬间”摄影工作坊。此次活动有逾200人出席，其中不乏友族同胞，反响热烈。

工作坊共分为两个环节，分别为现场外景摄影及摄影讲座。为体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华族、印度族及马来族的模特展示民族特色服饰，配合参与者进行现场拍摄，还请来了9位专业摄影老师，现场对参与者进行指导。

现场外景摄影结束后，主办方还特别邀请了本地摄影大师李海宝做主讲嘉宾，分享文化主题的摄影心得及拍摄技巧。

摄影工作坊成功为首届“心系新加坡”大赛造势，许多参与工作坊的摄影爱好者也积极提交作品，参与摄影比赛。

(部分获奖作品见封二、三、四)



1月6日及7日在国家图书馆底层1楼展开为期2天的摄影作品展览



近30位政要议员出席了戊戌狗年新春团拜

千人同贺戊戌狗年

2018年2月18日大年初三，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7楼多功能礼堂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洋溢着浓浓的新春气氛。近1000位受邀嘉宾出席了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的新春团拜。主宾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主持了新春团拜仪式。

出席此次活动的贵宾还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总理公署部长兼外交部和人力部第二部长杨莉明等近30位政要议员，中国、美国、英国、亚细安国家等多位外交使节，宗乡团体代表、本地文化与艺术团体代表、各族群代表，以及本地各大学府的超过200位学生代表，其中包括2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校学生。

承前启后 开创未来

团拜会由立化中学舞蹈团带来的舞蹈表演《鼓韵宏程》拉开序幕。首先由宗乡总会会长兼新加坡华族文化

中心主席蔡天宝致欢迎词。蔡天宝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收获颇丰。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将延续这股力量，秉承推动华社、发展本土华族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宗旨，继续开展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蔡天宝也介绍了今年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的行动计划。宗乡总会今年将放手让年轻人共同筹划一系列公益活动，培养他们的领袖才能，凝聚年轻人的力量。为配合2019年新加坡开埠两百年，宗乡总会正在筹划“无名英雄”系列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回顾历史，纪念先贤。而今年要推出该系列的第一项活动——“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这项活动将与李光耀双语基金合作，以多感官的体验方式叙述国家发展历程，让学生通过实体接触和虚拟互动感受先贤们如何以自身微小的力量造就今天的新加坡。

华族文化中心也将会在今年迎来第一个周年庆，举办第二届“华彩”文化节。华族文化中心将继续和文化艺术团体及学校合作，把华族文化推广给更多的年轻朋友，也让国人加深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蔡天宝也



华社共聚庆祝新春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把今年4月即将到任的华族文化中心新总裁刘思伟介绍给来宾。蔡天宝说，刘思伟在文化艺术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策展和公共教育方面，更有独到之处。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文化中心必定迈上一个新台阶。

未雨绸缪 把握机会

张志贤副总理用华语致词，他从两方面谈了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第一，经济和工作。去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是3.6%，今年预计在1.5%到3.5%。政府了解商家和国人在经济重组中面对的挑战。政府将继续和大家紧密合作，提高生产力，掌握新商机。张志贤说：“财政部长明天会发表政府的财政预算。虽然我们都希望有个大红包，但是更重要地是我们如何继续和商会、公会合作，帮助各企业转型，发展数码等科技。我们会帮助工人有更多机会提升知识和技能。”

第二，要继续互相关怀，为国人提供更好的成功机会。政府会继续帮助国人成家，更快拥有组屋，养育孩子，照顾长辈。我们会更关注医药保健，帮助乐龄人士安享晚年，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应付未来的需

求。“建国一代为我们储备了资源。同样地，我们要为下一代准备，我们的孩子们才能有更好的基础和机会取得成功。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可以建设一个更有活力，人人互相关怀的家园。”

同贺新春 携手共进

中午12时，所有来宾围成一个大圈，一同鞠躬，伴随着爆竹声，大家互道“狗年大吉，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随后，宗乡总会理事、华族文化中心董事以及两个机构的职员，和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们一起走入圈内，唱着新春组曲，跳着新年的舞蹈，带领来宾们一起玩起了“新春快闪”，将活动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在回响吹打乐团喜庆的新年组曲的伴随下，来宾们一边享用主办方精心准备的自助餐，一边相互拜年、交流。主办方还在现场设有美食、挥春等摊位，让大家感受新年的气息。活动结束后，每位来宾都获赠两个象征着“大吉大利”的橘子，将新年的祝福带回家。

古典印度乐舞之家

访新加坡印度艺术学校校长山卡·拉詹



文·吴明珠 图·新加坡印度艺术学校

小 印度Starlight Road的小巷里有一间简朴的音乐学校——新加坡印度艺术学校(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简称SIFAS)。在没有举办音乐会的日子里，学校是挺安静的，然而一有音乐会，学校里的气氛立刻充满了动感，悦耳的音符在空气中飘荡，观赏音乐会的观众都面带笑容。

这一幢四层楼的建筑在古朴中有一丝乡村学校的韵味。一进校门是一个小型的停车场，旁边有一株枝叶繁密的老芒果树。首先见到的是校长的办公室。办公室旁边的小走廊后面是一个铺了石灰的空间，天花板上装了几只风扇，一看就知道是旧时代的学校食堂。和食堂截然不同的地方是空间的左边盖了一个柚木地板的弧形

舞台。再往前走是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了一些热带的植物和花卉。笔者到访时炎阳高照，一个印度园丁正在浇花，沙沙的水声给人带来一丝凉意。

在我国普遍采用冷气礼堂的时代，为什么SIFAS的礼堂却是开放式的？

校长山卡·拉詹(Shankar Rajan)说：“我们曾经开会讨论要不要装置冷气，后来决定还是不要，因为我们喜欢开放式的空间，开放式的空间空气流通，使人感觉舒畅，很适合举行音乐会。”笔者是个印度古典乐迷，曾观赏在这里举行的多场音乐会。凉快的夜晚，舞台上乐器齐鸣，表演者载歌载舞，这种美妙的感觉在冷气的音乐厅没法感受。



印度古典乐舞领域的大功臣

千万不要小看这间不起眼的学校——新加坡印度艺术学校可是我国印度古典音乐舞蹈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功臣。

学校的源起有一段小故事。上世纪40年代末有一个名叫S.N. Durai的印度籍音乐爱好者，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朋友告诉他儿子在学西乐的小提琴。他问朋友他的孩子为何不学印度小提琴，朋友回答说找不到老师。Durai说：“我听了觉得很苦恼，我们将失去我们的音乐。” Durai希望能成立一间印度艺术协会让年轻的印度人有学习乐舞的机会。他四处游说朋友和他合作，最后终于在1949年5月7日和他一个名叫Subban的同事一起去社团注册局注册一间印度艺术协会，学会地址在132, Serangoon Road, 是Durai的住所。1956年，文化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为协会主持开幕仪式。在那个时代SIFAS 是唯一的印度古典乐舞学校，教授这两门艺术的私人老师寥寥无几。1968年，SIFAS约有一百

位学生，学习南印度古典舞和声乐、Veena 琴、印度小提琴及南印度鼓。同年学校在St Michael's Road租下一间公寓。接下来的几年，学校因经济问题曾数度搬迁。1992年国家艺术理事会出面支持，将Rangoon Road小学分配给SIFAS，艺术学校从此有了固定的校址。

这一段轶事记录在KALA MANJARI - 50 Years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and Dance In Singapore(印度古典乐舞在新加坡的50年)中。Kala Manjari意思是“艺术的花束”。这一本艺术专辑是一群参与印度表演艺术的人士应国家图书馆邀请而撰写，是新忆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之新忆工程基金(irememberSG FUND)为庆祝建国50周年出版的刊物。

Kala Manjari于2015年出版，一共分成10章。分别是：1.《独立之前的先驱艺术家和艺术机构》，2.《独立之后印度表演艺术的觉醒和成熟》，3.《2000年：新的表演场所、艺术节及新来的人才》，4.《四大机构

以外的独立艺术团体》，5.《北印度艺术在新加坡的发展情况》，6.《文化的桥梁：印度艺术对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影响》，7.《印度庙里的旋律》，8.《新印的交流》，9.《支持印度艺术的政府部门，私人机构及社会人士》及10.《结语》。全书厚达200多页，配有多张精彩的照片。

行政与音乐才华兼具的校长

有音乐才华的山卡·拉詹(68岁)出生于本地，父亲是一位药剂师，酷爱音乐；母亲是有专业资格的印度古典音乐家。山卡和妹妹在音乐声中长大。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南印度古典音乐，很想当音乐家但是当时没有良好的训练环境。”他8岁开始学习南印度鼓(Mridangam)，11岁就登台举行结业表演，在当时是我国首创。后来在莱佛士书院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上课，考获科学系学士文凭。毕业后参加国民服役，服役完被国大聘请为行政人员。2005年以国大财政部门副主任身份退休。2006年加入SIFAS担任主任。两年后山卡升任校长，于2012年退休。

“我退休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希望雇用一個比我年轻的人。”退休之后山卡积极地领导人民协会属下的新加坡印度乐团及合唱团(Singapore Indian Orchestra)，同时也在教育部属下的Umar Palavar Tamil Centre 教授淡米尔文。山卡退休期间，Ms BK Kana Gopal接任，直到2017年5月SIFAS重新聘请山卡。

他说：“音乐是我终生的伴侣。我喜欢表演南印度鼓和Kanjira(打击乐器)。在台上表演，我很有满足感和成就感。”山卡于1992年荣获半古典声乐奖(Singai-Gamma Award for Semi-classical Singing)。2012年荣获印度杂志Sudesi颁发的Visishta 音乐奖。他的太太在2006年去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律师，两人都在SIFAS接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山卡有3个孙子。

多元化的印度表演艺术训练

SIFAS以梵文“Kala Samskrithi”作为学校的创立哲学，意思是：“艺术是文明的表征”。学校共有28位全职教员，1800个学生，分别攻读为期5年和8年的课程。攻读的项目包括南、北印度的音乐舞蹈及纯美术。

监考及评估官都是印度著名的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及卡拉塞特拉音乐舞蹈学院(Kalakshetra)的教学人员。完成5年课程的学生能获得毕业证书，完成8年课程的学生获得毕业文凭。学校另外还为不想参加考试的学生提供个人和小组课程。

近几年来，SIFAS学生人数激增，北印度的声乐、锡塔琴(Sitar)、Tabla鼓及卡踏舞(Kathak)特别受欢迎。SIFAS也拥有自己的50人乐团。

2005年5月1日，SIFAS的南印度鼓老师T.R. Sundaresan打破健力士36小时的世界最久打击乐表演记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non-stop solo percussion)。他从5月1日凌晨5点开始打鼓，创下42小时的记录。期间他为40位舞蹈员，声乐和音乐表演者伴奏。Sundaresan这一项不平凡的表现成为印度艺术圈的佳话。

印度艺术家的支持

开创于艺术氛围薄弱，资源短缺的时代，SIFAS一路艰苦走来，终有今日的规模。其中印度艺术家的支持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Kala Manjari《新印之间的交流》一章中，作者山卡追溯新、印两地艺术家的密切联系。文中指出，早在100多年前印度的舞蹈和音乐家就开始陆续来新表演或授课。其中一群经常前来协助本地团体编舞，编曲或指挥的专才更丰富了这一块艺术的园地。山卡说：“由于他们的努力，印度乐舞的表演和创作水平得以提高，新加坡的艺人和观众都受益不浅。”

一年一度的表演艺术节

自2003年起SIFAS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印度音乐舞蹈节(SIFAS Festival of Music and Dance)。这一个艺术节以南印度车奈(Chennai)每年12月的艺术季为参照，从3月开始一直举办到4月中。“我们的艺术节有两个宗旨：一来为本地日益增加的观众提供类似车奈艺术季的节目，我们因此邀请来自印度的著名艺术家呈现高水准的节目；二来我们通过艺术节给本地各年龄层的表演者提供表演的机会。”由印度艺术家表演的节目在Esplanade Theatres on the Bay(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举行，属于售票性质。由本地表演者呈现的节目安排在周日晚上及周末全日，在SIFAS礼堂举行，免费为公众

人士开放。本地的表演者经由印度资深的音乐家试音筛选。每一年呈现约50场演出。艺术节为有潜质的青年人提供良好的训练机会，他们当中有些已经能在印度及其它国家登台表演。比较出色的表演者包括：Sushma Somasekharan, Nishanth Thiagarajan, Sudarshan Narasimhan, Mythili Rajaraman, Chitra Poornima Sathish和 Srikanth Radhakrishnan等。

为了培养新生代的艺术人才，艺术节负责人拨一天让16岁以下的少年表演时间较短的声乐和器乐，培养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经验；并称之为“明日之星”(Rising Stars)专场。每年约5,000人观赏SIFAS艺术节的各项演出。

由于印度艺术圈“四大”(Big Four)的努力，千禧年是印度乐舞的蓬勃时期。所谓Big Four是本地最活跃的印度艺术团体：SIFAS, Nrityalaya Aesthetics Society(又称Bhaskar's Arts Academy), Apsaras Arts及Temple of Fine Arts。

SIFAS这几年有什么改变？山卡开心地告诉我：“现今的学生对学习非常热诚，这是一个好现象。”

自2010年开始，SIFAS和University of Madras联合在车奈举办常年艺术节(SIFAS Chennai Festival)，一连三年。之后SIFAS自己举办。

山卡说：“SIFAS应该发展成一间国际学校。我刚从SIFAS Chennai Festival回来。那里的人对我们本地的表演者非常欣赏。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和淡米尔·纳都省著名的Annamalai University合作。”

2018年SIFAS将举行几个艺术节。常年的艺术节将在3月16日开始，4月8日结束。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HOUS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AND DANCE

There is a music school tucked away in the little lane of Starlight Road. It can be very quiet when there is no concert. When there is, the atmosphere brightens up with delightful melodies in the air and smiles on the faces of audiences. The school- 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known as SIFAS) is an old building with a rustic touch. It has an open-air auditorium which makes concerts more enjoyable. Though it looks simple, it is a major contribu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and dance in Singapore.

One day in 1940s an Indian man named S.N. Dura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and was shocked that this friend's son was taking up Western violin. He was upset that Indian music might be losing its young practitioners. Durai then applied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 music school and SIFAS was founded on 7th May 1949 with his house as its venue. This anecdote was recorded in KALA MANJARI-50 YEARS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AND DANCE IN SINGAPORE. The book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s part of the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s irememberSG Fund to celebrate Singapore's 50th birthday.

Shankar Rajan, Principal of SIFAS, is an accomplished musician who performed his Arangetram (for Mridangam) at 11. He retired from SIFAS in 2012 and re-joined SIFAS in 2017. He has received two musical awards.

SIFAS has 28 teachers and 1,800 students learning Northern and Southern Indian classical vocals, instruments and dances as well as fine art.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a 5-year course receive a certificate while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an 8-year course receive a diploma. There are also courses f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do not wish to take exa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Northern India arts such as sitar, tabla and kathak have been particularly popular. In May 2005 SIFAS' mridangam teacher T.R. Sundaresan broke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non-stop solo percussion by playing the mridangam for 42 hours.

The support of artists from India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performing arts here. Indian performing artists have been coming here to perform, conduct and choreograph in the past century.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benefitted local artists and audiences.

A major annual event which SIFAS organises is the SIFAS Festival of Music and Dance. At the festival which runs from March to April, there are ticketing performances held at the Esplanade Theatres on the Bay and in-house performances held at the SIFAS auditorium. Every year about 5,000 people visit the performances. The in-house shows aim at grooming performers. Some seasoned performers perform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The festival also offers stage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aged 16 and below. There is also an annual SIFAS Chennai Festival held in Chennai to showcase local talents.

Shankar is pleased that current students have shown great enthusiasm in learning the art, which is good for SIFAS. He thinks SIFAS should go international.

旧貌新颜。

加东文化之旅

珠绣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
图片来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文图 · 李国樑

2017年11月4日，宗乡总会主办的文化之旅，我们四位博物馆义务导览员跟90人的团队一起穿街走巷，来到加东这个“土生华人区”。

加东(katong)的意思是海滩的波纹，可见过去这里碧海秋波，是个罗曼蒂克的好地方。至于加东有多大？民间的共识是从加东公园(Katong Park)到实乞纳路(Siglap Road)，南北以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与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为界。

加东距离东海岸公园约一公里，但是半个世纪前，加东就座落在海边，宏伟的郊外别墅，名人故居夜夜笙歌，简朴的马来甘榜，华人的渔舟唱晚，打造着悠闲生活的风情。九皇爷诞辰到了，巴耶里峇葱茅园的信徒浩浩荡荡，游行到加东海边迎神送神。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这儿野餐游泳，为加东增添热闹的气氛。加东的

东海岸路(East Coast Road)是海岸最佳的见证。

东海岸路上有独立式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乐斯戏院和丽宫戏院，为附近居民提供大众娱乐。上世纪90年代初费玉清来新加坡登台，丽宫戏院就是小哥的福地，师奶带着鲜花哨子来捧小哥，场面十分轰动。

建在“海上”的组屋区

新加坡独立后，附近山丘的土壤将加东海滩填平，兴建马林百列组屋区，东海岸公园大道为来往樟宜机场与市区的人士提供环海的风景线。海上商船熙熙攘攘，天气好的时候还可眺望廖内群岛，偶尔水中央出现龙卷风，为生活增添另一番姿彩。

马林百列是本地第一个兴建在填土地带的组屋区，如今这里有约7,800间组屋与两万多居民。1972年第一

批组屋落成后，居民开心地迁入“海上”的新家。没多久，发觉到窗户特别容易生锈，住上没几年铁框一片片地剥落了。原来海边的空气潮湿，海风带着咸味，普通钢铁经不起腐蚀，必须改用与一般组屋不同的防锈材料。

从椰林到“阿公的路”

加东的发展史跟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分不开。早在1823年，法夸尔被莱佛士革职之前，他的女婿Francis James Bernard买下了加东的土地来开辟椰园。热带的沙滩气候最适合椰树生长，难怪从芽笼河往东行，一路都种满椰树，大园主拥有的土地几乎等于半个碧山镇。

19世纪的加东跟财富与地位分不开，富裕的洋人、犹太人、欧亚族群、锡兰人、土生华人和南来先民纷纷到加东安家，战前的主要居民则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上阶级。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包括殖民地时代的第一任警监Thomas Dunman(Dunman Road，德明中学)，葡萄牙医生Jose d'Almeida(莱佛士坊的D'almeida Street)，三国领事胡亚基(黄埔)和地主周如切(Joo Chiat Road)等。

周炳镜(Philip Chew)是周如切的曾孙。由于如切路是他的“阿公的路”，因此对如切这个地区作了深入研究。原来20世纪初，殖民地政府跟周如切商讨在他的椰园开辟一条公路，从东海岸通往芽笼士乃。周如切表示我的土地是不卖的，但你们可以建路，日后就有了以他命名的如切路，如切台、如切巷等。交通便利了，椰林逐渐消失了，周如切的名字则跟加东连为一体了。

如切路附近以名人命名的支路还有Ean Kiam Place

(陈延谦，慈善家)，Marshall Road(马绍尔，第一任市委会主席)，Onan Road(Onan bin Rajidin，建立回教堂)，Koon Seng Road(钟坤成，房产中介先驱)等。

吸睛的老建筑

加东受保留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外墙上的图案，则是华人、马来回教徒和欧洲人的文化结晶，有华丽的科林殿式希腊柱头，地中海式百叶窗，凤凰、蝙蝠及花卉组构成的吉祥图案，还有色彩鲜艳的花砖。多元的搭配除了体现艺术的美感外，也展示了各族群文化的包容性。

东海岸路长满青龙木，又名紫檀、帝皇木、红木(Rose Wood)，是制造家具和雕刻艺术品的上等材料。大树旁有三栋别具风味的古老建筑：第一座是保留着浓郁的上世纪70年代建筑风格的加东购物中心，第二座是转型为餐馆的前如切警察局，第三座是隶属回教慈善产业的红屋。

加东购物中心于1973年启业，是新加坡第一座全冷气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旁就是曾经叱咤一时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了。20多年前，本地电影业面对录像光碟的强劲竞争，大型电影院逐一没落。加东购物中心扩张版图，将戏院吞了。

1928年落成的殖民地风格的如切警署，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私会党而设的。警匪专家何盈表示，早年每家警署都设立了私会党调查组，私会党徒被捕后，先拘留在警署内，被法庭定罪后才关入樟宜监狱。如切警署地方大，成为主要的拘留所之一。上世纪80年代内政部改



东海岸路支路罕见的浮脚排屋，这列排屋的尽头就是从前的海墙



东海岸路原为海边道路，如今路上长满了青龙木。道路旁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

组后，调查私会党的任务才交由罪案调查署(CID)负责。

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Katong Bakery & Confectionery)楼上住家，楼下店面则由犹太人售卖瑞士卷(Swiss roll)、咖喱角和面包。1925年店主去世后，由海南籍人士接手，推出了新加坡第一个三层结婚蛋糕，为新人婚礼增添了甜蜜与浪漫。

面包为新马华人的“传统食物”，追溯起来并不传统，而是来自洋人家庭。早期的海南移民跑洋船，在船上当海员兼侍应生，有些则在洋人和峇峇家庭当厨师，逐渐掌握到西式厨艺。他们将欧洲人的饮食料理本土化，通过咖啡店与面包店，普及到各个华人角落，成为“传统”南洋早餐。

嘉东面包厂运作了80年后，因建筑结构出现状况而关闭了，最近才重新开放，以复古的咖啡店门面经营。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Sheriffa Zain)于20世纪中叶将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捐赠给回教慈善基金(Wakaf Ilmu)，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莎丽花扎因出生于富裕的阿沙卡夫(Alsagoff)家庭，她的父亲就是在甘榜格南设立了本地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的阿拉伯富商，外曾祖母花蒂玛(Hajjah Fatimah)则在美芝路创建了花蒂玛回教堂。阿沙卡夫家族一向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善好施的心意代代相传，堪称本地回教人士的典范。

锡兰路上的庙宇教堂

东海岸路有一条名为锡兰路(Ceylon Road)的支路，屹立着典雅的圣帕加维那雅加神庙(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神庙由锡兰人(斯里兰卡)创建，五层的黄色门塔跟本地常见的色彩缤纷的兴都庙风格完全不同。

庙宇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座神庙是很多元化的。2003年重建时，建筑师是华族佛教徒，负责重建工程的也是华人建筑商，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大方解囊，捐款资助。该神庙起源于一个半世纪前，当时信徒在附近的池塘边发现了维那雅加王(象神甘尼沙Ganesha)的雕像，于是建立了简陋的庙宇来供奉象神。

象神是破除障碍之神。信徒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大小事都是象神的旨意，万能慈悲的象神能够为信徒消除人生中的种种阻障，引导大家踏上康庄大道。

距离兴都庙百米之遥，有长老会的栋材堂和圣公会的圣希达尔教堂。1948年落成的栋材堂原为一所小学，叶栋材牧师的遗孀和女婿以叶牧师的名义创校，为战后的婴儿潮贡献了一份力量，上世纪80年代才将原建筑改为教堂。

至于圣希达尔教堂，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教堂建筑旁的洗礼池和洗礼盆。接受洗礼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洁白的衣服，在众兄弟姐妹的见证下，走入池水中受洗，称为“浸信”。婴儿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则在洗礼盆“点洗”，一旁的狗牙花(马蹄香)散发出阵阵茉莉花般的幽香，为信徒献上祝福。

经典女红装

曾几何时，加东的土生华人打造着独特的文化氛围。随着时代变迁，这批“原住民”搬的搬，走的走，浓郁的



土生气息逐渐消失。昔日居住在这里的土生华人的特点是以与闽南话混杂的峇峇马来语交谈，妇女穿着秀丽得体的沙龙可巴雅(sarong kebaya)和珠绣鞋子(kasut manik)，表示对家人与宾客的尊重。

沙龙可巴雅的峇迪沙龙源自爪哇蜡染艺术，花纹图案则融合了欧洲的美术特性。可巴雅特色为长袖开襟，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这些蕾丝和胸针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珠绣则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她们必须学得一手好珠绣，才能嫁入好婆家。这些产自日本与欧洲的珠子可串织成鞋子、腰带、钱包和头饰。一双精致的珠绣鞋，鞋面可用上整万颗珠子，非常考究功夫与耐性。

美食人生

迈入21世纪后，商家跟旅游局联手打造下，东海岸路和如切路交界处一带，出现了土生华人特色的娘惹餐馆、金珠(Kim Choo Kueh Chang)和Rumah Bebe等小型展馆和商店，重塑消失的生活原貌。

金珠的东主之一Edmond告诉我们，这门家族生意已经传了三代。创始人李金珠女士乃南来的第四代华人，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她12岁就从祖母那儿学来制作娘惹粽的窍门，每年端午节帮忙裹粽卖粽。1945年日据时期，生育了四个孩子的李金珠为了帮补家用，在Joo Chiat Place自家锌板屋门前摆摊卖粽，没想到转眼间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金珠的品牌为“kueh chang”，就是糕饼(kueh)和粽子(chang)。先民将粽子带到南洋，土生华人则将祖先的粽子南洋化。金珠娘惹粽小巧玲珑，使用的是瘦肉和甜冬瓜，粽叶则是就地取材的班兰叶。娘惹粽味道偏甜，有一股班兰叶的幽香，跟一般使用肥猪肉和竹叶包裹的肉粽不一样。

当今农历新年期间颇畅销的黄梨挞是另一个文化交融的好例子。黄梨的福建话和粤语是“旺来”，兴兴旺旺谁不爱？大家都说黄梨挞是娘惹食品，不过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节庆同样离不开它。早期欧洲人的下午茶都会吃一些奶油饼干，我小时候，大人称这些饼干为“番仔饼”。心灵手巧的娘惹将番仔饼和新马种植的黄梨结合起来，精心研发了黄梨挞，各族人士吃过后都赞不绝口，于是在民间流行起来。



可巴雅的特色为长袖开襟，使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

汤汁香浓偏白，散发着椰浆香的加东叻沙所承载的，则是先民为生活打拼，推陈出新的故事。乐斯广场(Roxy Square，前乐斯戏院原址)地面层有家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字号“正宗加东汤匙叻沙”。早在七八十年前，昵称Janggut(大胡子)的黄老先生，挑着扁担在加东沿街贩卖娘惹叻沙。他将粗米粉剪短，方便食客用汤匙将食物和汤汁一起送入口中。后来租下东海岸路咖啡店的摊位，向日晒雨淋的日子告别。近年来才搬到乐斯广场。

原来的摊位由南茜租了下来，卖的是“328加东叻沙”。取名328是为了易读易记，谐音“生意发”，顾客喜爱，店主更加喜欢，还在附近开了分店。南茜推出自家的加东叻沙，主要是想让食客吃得开心，欣赏厨师的手艺，她就心满意足了。

土生华人的九层糕

小时候偏爱的一毛钱一个的九层糕，滑溜溜的质感、彩虹般的色彩令人垂涎。这些颜色都是天然色素，譬如蓝色来自蓝蝶豆，绿色来自班兰叶，红色来自红糟。当时我们都很珍惜，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吞下去，而是一片片地撕

开来小口轻尝。

源自土生华人的九层糕顾名思义，共九层，寓意长长久久，原意是一层层地剥开来放入口中。Edmond解释道，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意气风发，有时候阻碍重重，无论是开心或低落，路都必须行一程看一程地走下去，失败了站起来，整装后再出发。年老时回望前尘，原来经历了风雨艰辛，尝尽了苦辣甜酸，努力耕耘的岁月编织出靓丽的彩虹。一页页地翻阅，一片片地品尝，就像手中色彩斑斓的九层糕。

我们由衷希望吃喝玩乐之余，加东文化之旅能够让大家深一层了解到先民离乡背井后，广纳各族文化的大气度，为新加坡发热发光。日后回忆起这一趟加东行，原来也像九层糕那样，值得细细咀嚼，开心回味。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主要参考资料

1. Edmond Wong, Kim Choo Kueh Chang的成立背景与娘惹文化的口述, 2017年10月19日。
2. Lily Kong, T C Chang, "JOO CHIAT a living legacy", Joo Chiat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001.
3. Long, "何谓土生 Peranakan", <http://dragon-descendants.wixsite.com/long/peranakan>. Accessed 3 November 2017.
4. Philip Chew, "History of Joo Chiat Road", <http://mychewjoochiat.blogspot.sg/2009/03/history-of-joo-chiat-road.html>.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5. "Rediscover the East", URA, November 2004.
6. Shefali Rekhi, "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consecration ceremony: 5 things about the historic temple in Ceylon Road", 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21, 2015.
7. "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booklet.
8. Vernon Cornelius,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Infopedia -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29_2005-01-18.html. Accessed 2 November 2017.

Katong, a Living Legacy

Katong refers to the rippling effect of a sea mirage when looking at a shorelin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Katong was developed as coconut plantations stretching from Geylang River to Siglap Road. Since the 1920s, many people moved out of the city and ventured into Katong. The area was a famous seaside, ideal for weekend retreat for the wealthy city dwellers. Bungalows, shophouses and places of worship were built for the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Today, Katong is a conserved site with rich architecture and heritage. Katong's identity is especially shaped by its colourful two-storey pre-war shophouses and terrace houses. Their facades are often decorated with stylish columns, intricate motifs and ceramic tiles, not only depicting Chinese and Malay cultures but also European influences.

East Coast Road and Joo Chiat Road are the two main roads in Katong. As the name East Coast implies, the road was located by the sea. Today, the seafront has been pushed one kilometre away. Marine Parade and East Coast Park are built on reclaimed land after Singapore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Chew Joo Chiat owned a vast piece of land in the area for his coconut plantations. In 1916 the Municipality wanted to buy land from Chew Joo Chiat to build a proper road from Geylang Serai that extends all the way to the beach for the wealthy. Chew foresaw the benefit of a road going through his coconut estates and donated the land instead of selling. A proper road was constructed a year later and was named after him in recognition of his generosity.

The former Joo Chiat Police Station is an important landmark along East Coast Road. It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nfamous places for secret society members up to 1970s. Triad members were locked up here and transferred to Changi Prison upon being sentenced in court.

The "Red House" Bakery, once famous for its Swiss rolls and curry puffs, is iconic along East Coast Road. It was originally built as a private residence cum bakery which operated for 80 years. The building was subsequently deemed unsafe and renovated as a bakery once again in 2016 after closing down for 13 years. The Red House came under the ownership of the Alsagoff family in 1957 and was donated to Wakaf Islamic endowments. The revenue is to fund a dispensary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care for the needy of all wards.

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sits on Ceylon Road which reflects the mix of cultures in Katong. According to the temple management, Lord Vinayagar's statue (the Hindu Elephant God) was said to be found under a Senpaga tree. The Ceylonese Tamil pioneer built a small attap-hut for the god in 1875. The temple was rebuilt a few times since then.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n cohesion was at work in other forms for the temple. The yellow-coloured Rajagopuram, designed by a local Chinese Buddhism architect when the temple was rebuilt in 2003, makes it uniquely different from many decorative Tamil temples in Singapore. Chinese contractors were involved in the rebuilding program, which wa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Muslims, Buddhists and Christians.

Katong was once branded as a Chinese Peranakan neighbourhood. When more and more HDB flats were built, the community had moved out while new owners settled in. Katong appeared to lose its Peranakan flavour.

The Peranakan culture was revitalis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Near the junction of East Coast Road and Joo Chiat Road, two Peranakan shophouses Rumah Bebe and Kim Choo Kueh Chang stand beside each other. The Rumah Bebe story begins with nyonya Bebe Seet. She was encourage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Peranakan art of beading slippers (kasut manik). In the good old days, young nyonys were skilful in beading their own footwear. Howeve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ading became a dying craft. Bebe researched the history of beading done by the nyonys of the past and started holding classes for those who are equally passionate about the craft.

Edmond, the great grandson of Kim Choo, told us that Kim Choo came from Malacca. She learned the skill of making Nyonya rice dumplings from her mothe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she set up a Nyonya Chang stall outside their house on Joo Chiat Place under a banyan tree. Kim Choo Kueh Chang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n.

The Nyonya delicacy 9-layer kueh lapis is probably one of a kid's many favourites and are still treasured by many adults today. The most classic way of eating this kueh is by peeling it layer by layer. The multiple colours are from natural sources such as pandan leaves and blue pea flowers. The kueh lapis is steamed layer by layer. It requires passion and patience which our elders were blessed with back then when the pace of life was slower. We have since advanced so much but we should also spare the time to chew at our past and pause to think about our sense and purpose.

看得见的音乐

吴耀基书法展

文·槐华

纸

，白；墨，黑。

黑白之间，其实是有限中的无限。

清邓石如“计白当黑”，黑绘形、白传神。

尤其狂草，晋王羲之赞叹：“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更早的唐张旭，已惊悟公孙大娘之剑舞。师“颠张”出“狂素”，即怀素也。不料唐张怀瓘更从狂草中，“听”出“无声之音”！

我看狂草，如见秦汉《长袖舞》、唐宋《踏歌》，更惊奇它是“星河欲转千帆舞”（宋李清照）。

吴耀基是特许会计师，我不被他的“特许”吓到，倒是他旷世的书法，我立刻记起：明项穆所赞许魏钟繇、唐怀素之字，字形“既方”、用笔“更圆”。吴耀基何尝不然！其直笔“平直振动”（王羲之），如音叉；飞白“见婀娜”（清沈宗骞）；渴笔知“于转折处笔锋变换之妙”……

他，每个周末独自练字，早已荒疏了上世纪70年代他念南大会计系时醉心的口琴。

我不忍告诉他——

英国名曲《斯卡布罗集市》

那忧伤的

少女 曾是

他的心爱……

这“少女”，曾似他的“口琴”。

2005年起，他写字又作曲，笔名遥祺。

他的乐思——带着波兰萧邦式的忧郁，又似德国黑格尔所主张的音乐辩证法，“在音乐里纵然是表现痛苦”，也要使人听到“甜蜜的怨诉”。

诚然，吴耀基当“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春秋老子）

所以他2018年个人书法展，正是长相思啊，南大“儿女多奇志”！

（作者为本地诗人、作曲家）

展期：2018年2月28日至3月6日（2018年3月2日晚7时开幕式）

时间：11时 - 19时

地点：ION Art Gallery Level 4, No 2 Orchard Turn, Singapore 238801





众里寻他千百度

30年坚守文史哲讲座的海南会馆



文图 · 沈芯蕊

时光飞逝，往事前尘如旧。风格古雅的大厦，石狮子、半圆形拱门、书香满溢的礼堂，现今朴素而带着旧时华丽的海南会馆呈现于面前。傍晚时分，走进熟悉而亲切的礼堂的学员们，用一堂课，一首词来填补这周一傍晚的时光。

由海南会馆文教部创办的“中华文史哲讲座系列”，新一期课程于2018年1月8日星期一傍晚开讲。此课程自1988年开课以来，是新加坡宗乡会馆中唯一的一个连续30年开办的课程，已成为海南会馆的一个亮点！

新年伊始，老中青(70多人)不分年龄齐聚一堂，共同聆听和吸收鲜明生动的五千年中华文学、历史、哲学中的重要片段和精髓。其讲师团队由符传丰博士、

张从兴老师、李叶明老师组成。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符传丰博士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前德明政府中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开年第一讲，符博士主讲宋词中婉约派名篇赏析。宋词从风格上来分类，可分成婉约派与豪放派。婉约派作品一般婉转含蓄，内容侧重儿女风情，音律婉转和谐，有一种柔婉之美，作品在宋词中占了重要地位。这一讲介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及名作，如：李煜、晏几道、秦观、欧阳修、柳永、李清照等。

张从兴是新加坡资深媒体人、诗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哲学方面由张老师主讲北宋理学。他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说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爱莲说》；张载的《西铭》和《横渠四句教》；理念和性格迥异的程颢和程颐两兄弟……

李叶明是随笔南洋网创办人、主编，专栏作家，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历史方面由李老师主讲三家分晋：“战国为何从此开始？”；“孙臬庞涓，国家拼的是人才”；“真假苏秦，说客的能量有多大？”光看名字就能感受到课程的精彩了！

据符传丰博士介绍，该课程1988年创始之初，是由他及在报馆工作的韩山元与欧清池博士一起授课。直到2年前，韩老师过世之前，他去医院探望，韩老师还想将课程继续办到30年。他对自己的病情却并不担心，反而很关心课程的情况。韩山元是资深报人、知名文史工作者。他在退休之后，还去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这一生最大的忧虑，就是下一代年轻人不再认同故乡的文化。韩老师也经常组织文史之旅，带领大家认识大好河山。他一生热爱新闻事业，退休后又以文史工作为己任。

在韩老师离世后，他的子女也希望课程可以延续坚持下去，所以符老师找了张从兴与李叶明，3人再继续开课。符老师说：“有些老学员已经上过20多年了，也有很多新移民加入。讲了这么多年，课程内容也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随之改变，诠释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学生也轻松，没有考试，工作忙碌之余，还可以花2个小时来

上课很难得。这些文学作品既可以带给大家生活上的感悟也可以陶冶性情。如果引起兴趣多读，也能学到一些解读文学作品的有趣方法，更重要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对大家待人处事方面有帮助，这就是传统文化课程的现代意义，不做过多学术上的分析。”

年龄最大的学员已经80多岁，年轻的十几岁。课程做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也都成为朋友，大家还一起去郊游，并促成了几对情侣。一位20多年前来上课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国大中文系教授。他当年来听课时才15岁，周年庆时还来分享了当年趣事。很多人是一家人一起来上课，各行各业的人都来。符传丰博士是海南人，当年获得会馆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后来出于回馈会馆的想法来会馆任教，没想到一教就是30年。

重视文化传承的会馆

新加坡海南会馆(以下简称会馆)是海南籍华人的最高宗乡组织。前身为成立于1854年(也有1857年的说法)的新加坡琼州会馆。1994年9月16日正式改称新加坡海南会馆。

琼籍人士移民新加坡是从1850年开始，由于人数日渐繁多，所以于1854年由韩旺彝(亚二)、王志德等倡议组织琼籍同乡会。当时由韩、王两位联合乡亲集资2700元，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小坡吗拉峇街屋宇三间，作为会所。之后，由王永祥、周德炽、郑志禄、吴志裕等筹建会馆。1878年，购置美芝路47号为馆址，一直沿用至今。

1942年至1945年日治时期，会务陷于停顿。1945



连续30年的课程，已成为海南会馆的一个亮点



书香满溢的礼堂

年底，日本投降，会务恢复。1948年，由当时会馆主席符致逢及天后宫董事倡议重建。1959年获得政府批准，同年召开琼州各社团大会，成立琼州会馆(天后宫)改建委员会进行重建计划，经过多年努力筹款，1962年，7层楼大厦终告落成，于1963年4月7日举行开幕典礼。这座命名为“琼州大厦”的高楼，内有琼州天后宫，会馆使用1楼为办公处，其余为商用办公室，出租给商家。

1973年，会馆设立大学奖助学金，1974年颁发首届大学奖助学金，另外会馆还颁发高级中学与初级学院的奖学金，惠及同乡子弟。1976年，会馆创立互助部，为会员谋福利及发挥互助合作精神。1978年，会馆响应新加坡政府敬老尊贤运动，组织了敬老委员会，每年分发敬老度岁金。1979年起，会馆也积极响应和支持政府发起的各种运动，如爱国基金活动、推广讲华语运动、节省用水运动、礼貌运动、清洁卫生运动、守时运动、发扬东方传统等。

会馆有乒乓队，还成立了华乐团、口琴团、合唱团等。乒乓队历年都参加本地与全马社团的锦标赛，多次荣获团体冠军、亚军。口琴团、华乐团与合唱团也经常演出。80年代，会馆还先后设立了文学会、美术会、文史会、演讲会等。会讯于1984年起出版，报导会务活动，传达讯息给会员。

1984年12月，会馆与本地六大会馆联合发起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之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86年成立。1989年10月，会馆庆祝成立135周年，举办书画展、千人宴，发起召开第一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为加强世界各地海南乡团、乡亲的联系、合作与团结做出贡献。1993年，设立经济事务部，以协调同乡向工商领域进军。

1994年12月，会馆设立了“吴德耀教授文教基金”，同时出版《吴德耀教授文集》以纪念这位一代哲人。1995年，成立海南省籍教育基金，以助海南省培训人才。

服务社群 不遗余力

2004年，会馆为庆祝成立150周年，主办专题讲座“妈祖文化与新加坡社团”，同时又举办义走为“琼州乐善居”筹款。2005年9月，8级台风登陆海南，这是海南岛近32年来最强劲的台风，损失惨重，会

馆发起赈灾工作，为灾民筹募义款21,200多元。

2005年新届理事会成立后，即改进和提高会馆的行政效率，引进年青人和有才干的馆员加入领导层，积极推动会务，加强海南人的团结，同心协力为海南社群服务和工作。同年10月4日召开“海南乡团座谈会”；同时会馆代表团又先后访问海南各乡团，以加强会馆与各宗乡团体的联系与沟通。

2006年1月8日，会馆首次主办迎新会，同时以实际行动支持NKF为肾脏病人所做的努力而筹募义款。会馆与天后宫联合另捐献了一万元予NKF。2006年12月，为配合庆祝成立152周年，会馆主办了“首届新加坡海南传统文化节”。会馆自2006年以来便开始为嫁来新加坡的海南姑娘提供法律援助。目前有数名律师帮忙处理家庭纠纷和婚姻问题，已成立法律援助处，协助在异乡举目无亲的同乡。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地震，会馆及属下19个团体筹得34万余元义款。2009年，在会馆的组织下，由新加坡中央医院高级顾问专家李胜德教授率领的新加坡义诊团，带着对海南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对唇腭裂患者的关爱，开启惠及唇腭裂患者的“微笑工程”。

2009年10月，会馆成功主办了第11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暨第2届海南传统文化节，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南乡亲出席了这次盛会。2014年，海南会馆在庆祝160周年的同时也庆祝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成立25周年。2014年，海南会馆获得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颁发优秀会馆奖。

现今的海南会馆，拥有5000多名会员。会员分为团体与个人两种，本地的琼籍团体都是该会的会员。“小时候，父母问我，家在哪里？如果我回答出新加坡的地址就会被训斥，而正确答案只能是海南文昌公坡镇锦山头村。”父母的影响与教育让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对海南这片故土感情深厚。操着流利的海南话，却出生在新加坡的潘家海会长认为：“现在学校开设的华语课程，讲中华文化的部分较少，课程安排也不多。时代在进步，中国未来发展会吸引更多人来学习华语，学习中华文化。当年祖辈来新加坡发展，建立会馆服务乡亲，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会馆已经不需要帮助乡亲找工作找住宿，会馆要改变方针，更注重中华文化、海南文化的传承。”

通过会长的一席话及会馆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看出海南会馆30年坚守文史哲讲座的原因。

会馆的人文景观

巍峨堂皇的7层楼琼州大厦于1963年4月7日举行开幕典礼。当时不少马来西亚琼州会馆组织赠送祝贺的匾额，至今还悬挂在一楼的大厅。“琼州会馆”四字匾额，黑底金字，因年代太过久远，是哪位名家所书写，已不可考。而“海南会馆”四字却是海瑞的集字。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史载他的书法，笔力精绝、功力深厚、静逸而无妩媚之态。据王振春介绍，当时找不到海瑞写的“馆”字，只好找来他所写“食”与“官”两个边旁合并而成。

另一件海南会馆最古老的楹联是清朝驻新加坡的总领事黄遵宪留下的，这对楹联原来是放在天后宫的柱子上，后来移到会馆的大厅里。据说这位总领事虽然很有学问，但自认字写得不好，很少题字，所以这成为新加坡留下的唯一一副黄遵宪楹联题字。黄遵宪的楹联内容是：入耳尽方言，听海客赢谈，越人乡语；缠腰数豪富，有大秦金缕，拂簪珠尘。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清末杰出的爱国诗人、政治家。他曾先后出任清朝驻日本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



潘家海会长说：会馆要改变方针，更注重中华文化、海南文化的传承

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他的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把他比作唐代曾在岭南荒蛮之地传播文明的韩愈。黄遵宪从广东梅县抵达北京考中举人后，本可继续登进士、入翰林，可他毅然摆脱科举考试的束缚，远涉重洋，和外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和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以随机应变的公关谋略，确保了华侨在海内外的正当权益，和华侨建立了友好亲密的关系。

清代文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贴切的比喻，使读书的三种境界形象化了。海南会馆在弘扬中华文化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这一点在海南会馆坚持上课许多年的师生身上、在海南会馆的全体同仁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我想，他们很多人已达到了第三境界。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琼州会馆匾额及黄遵宪楹联



社团聚焦。

美食节场面火爆

舌尖上的福州



文图 · 俞玥

在福州会馆1月27日主办的福州传统风味美食节上，如果说会馆会员洪先生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大概是没有吃到自己的心爱的红糟鸡了。因为美食节刚开始不久，两个售卖红糟鸡的摊位就排起了长龙，他去别的摊位转了几圈，回来人龙始终不见缩短，直到两个摊位的红糟鸡双双告罄。

这场售卖福州精粹小吃的美食节，在4个小时内共吸引了两千多人品尝美食，大快朵颐，场面火爆，到下午3点活动结束时，大部分摊位的食物都超额完成了预计的销售量。

福州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福州菜是中华八大菜系闽菜的主体，源远流长，久负盛名。号称“天下第一汤”的佛跳墙就是闽菜的代表菜之一。除了能够摆上中国国宴的特色名菜，福州还有许多风味小吃。至于本地的福州菜和福州小吃则延续了中国福州的传统风味，令众多乡亲难以忘怀。特别是老一辈的福州人，他们关于福州美食的记忆，往往就是早餐时一碗鼎边糊配上一块蚵饼，晚餐来上一碗红糟鸡面线。

福州美食节是福州会馆的一个传统项目，每几年就举办一次，迄今已经举办到13届，采用过的形式有小吃摊位，也有美食宴会，每次都会吸引到众多的福州籍乡亲和其他籍贯的公众前来捧场。在今年的美食节开幕仪

式上，福州会馆主席程文奎表示，会馆举办美食节，不仅希望福州乡亲能在这些从小就熟悉的滋味中感受浓浓的乡情乡谊，也希望年轻的福州人和公众能够从中了解福州美食文化的魅力。

这届美食节再次采用小吃摊位的形式，共设有十多个摊位，推出的美食有三十多种。大家熟悉的福州鱼丸、红糟鸡、鼎边糊、福州蚵饼、福州年糕、光饼等传统小吃都能找到。总务陈莉玲介绍，为了让热爱福州美食的人尝到地道的食物，美食节工委做了精心准备。福州人“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逢年过节或婚丧喜庆，太平燕是必有的一道菜。在这次美食节上，单单是冷冻福州鱼丸和扁燕丸，工委就请来了三个商家售卖。老福州餐馆刚开张不久，有不少厨师也来自福州，他们为了这次美食节更是特地从福州直接进口了福州鱼丸和扁燕丸在美食节上售卖。文东记以鸡饭闻名，但老板程文华是地道福州人，福州鱼丸和燕丝球也是文东记的特色食品，这次程先生向美食节报效了福州鱼丸和燕丝丸以饷乡亲。另一个摊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江记鱼丸，这样，来宾们可以一次就尝到三地不同风味的鱼丸和燕丸，而且还可以打包冷冻鱼丸和燕丸，以备农历新年之用。

福州人最爱的鼎边糊，可说是尽显福州菜善于调

汤，滋味鲜甜的神韵，主料就是米浆，做法也不复杂，但要做得好仍需要一定的技巧。这次呈献这道美味小吃的也是老福州餐馆。鼎边糊的绝配蛎饼则是由本地颇有口碑的宝华蛎饼前来献艺。两个摊位的炉灶都设在大厦外面的大棚里，一是因为冷气的礼堂不能点明火，二来主办单位也希望来宾在一饱口福之前先睹美食的产生。在一楼见识了这两种美食的真材实料，和厨师们炮制美食的精湛技艺后，大家在二楼礼堂的这两个摊位前排起了长龙。人潮最多的时候，楼下厨师供不应求，楼上宾客则翘首以盼。

这次，会馆妇女组负责协办活动。妇女组里的几位烹饪能手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好几个摊位：福州春饼、糍丸、糟菜粉干、拗九粥……妇女组主任王品华在妇女组的动员会上一直强调，要把最具有福州传统特色的美食呈献出来。为此，她自己也拿出当年经营福州餐馆的看家本领，呈献两道本地不常见到却很地道的福州美食——炒糕、醉排骨。炒糕由番薯粉制成的果冻状甜点，也叫“炒肉糕”，虽没有肉，但从外观、色泽上看，与红烧肉相似，加上是用猪油炒制，还透着一股肉的香味。而“醉排骨”是一道绝不能望文生义的菜肴。不要以为这个“醉”与福州菜擅用的红糟、红酒有关，也不似上海菜中醉鸡、醉虾的作法，而是把酱汁直接浇在炸得酥脆的排骨上，有腌醉的意思。这恰恰说明了福州菜中酱汁独运、调味奇异的特点，所以味道让人心醉、陶醉、沉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交流，美食节工委特别邀请了汶莱福州十邑公会妇女组一行八位姐妹前来助阵，呈献诗巫福州干拌面。这是诗巫闻名遐迩的福州美食，配料简单朴实，但却香气扑鼻，十分诱人。佳肴虽美，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同乡鼎力相助的这份情谊。正如程文奎主席说的，美食节呈现的美食，虽然并不尽然名贵，但却体现了本地乃至本区域的福州社群为了推广福州美食而做的共同努力。

除了福州小吃，美食节也准备了丰富的福州干粮，有来自“小福州”实兆远的红糟、福州面线，也有福州人平日常吃的福州面片、锅边片、面线、白粿干、燕皮、糟菜、金钱饼等等。

这次美食节是舌尖上的盛宴，也是文化上的盛宴，福州会馆妇女组的姐妹们特地准备了一台丰富的节目，其中的福州文化元素为美食节的舞台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福州人在冬至有一个特别的习俗——搓糍，在节目中，妇女组表演了用福州方言朗诵的福州童谣《搓糍》。与此同时，也邀请现场的小朋友上台，手把手教他们搓糍，让他们亲身感受和学习福州的美食传统和文化。使用福州方言表演的戏曲闽剧也是福州独有的传统，在本地的年轻人中已不太为人熟知了，美食节上呈献的闽剧小调《亲母闹》，让现场的老一辈福州乡亲陶醉，也让包括非福州人的年轻一辈领略到福州戏曲文化的魅力。

(作者为福州会馆执行秘书)



美食飘香凝聚乡情(左起福州会馆交际股副主任邹奕珠、主席程文奎、副主席洪宝兴)

文字的臭虫



文·尤今

教

师节，接到一张学生自制的卡片，以流畅如水的文字记述他学习华文的心得和感想，我细细地读，深深地感动；然而，读到文末，却赫然被“文字的臭虫”狠狠地咬了一口，他如许写道：

“谭老师，我诚心祝您身体健康，青春永蛀。”

哎哟，那一年，我40岁，连青春的尾巴都拽不住了，他居然还要以“岁月的蛀虫”来“永远蛀我”！

我对着卡片苦笑，嘿嘿，嘿嘿。

“蛀”与“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文字的臭虫，在今日学生的作业里，铺天盖地。它们一口一口地将文句咬得遍体鳞伤、将文意弄得模糊不清。

深究起来，学生把冯京当马凉，错字连篇，不外以下几大原因：其一是粗心大意，犯错而没复查；其二是敷衍塞责，草草了事；其三是缺乏兴趣，随意交差；其四是水平低落，乱写一气。

教师必须找出病源，才能对症下药。

有一回，在休息时间，看到一名学生留在课室，勤奋地伏案而写，我好奇地趋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把“幡然醒悟”写成了“翻然醒悟”，补习老师罚他将“幡”重复地写1000次——1000次，听！不是1次、10次或100次啊，是1000次！师令难违，他满腹怨怒，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承受惩罚，他先写了1000个“巾”这个偏旁，才在旁边填上“番”。最后，“巾”和“番”这两者，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变成了一个“貌合神离”

的“幡”字，哎呀，同床异梦啊！

处于叛逆阶段的青少年，必须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能彰显惩罚的效果。倘若学生写错一个字而罚他重复地写上1000次，他以画图腾的方式来应付，不但无效，还可能在十指酸痛之余，对华文生出不该有的恨意，得不偿失呀！

在校教书时，我总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开门见山地对学 生 言 明 “零 错 字” 的 重 要 性。“文字的臭虫”就像是白蚁，让它在字里行间恣意游走，阴险毒辣的它，便会放肆地进行破坏工作，将文义咬得支离破碎，在视觉里留下一滩滩邈邈的污血。一篇内容独特、主题明确的作文，如果掺杂了许多错字，犹如一锅鲍鱼粥里掉进了许多颗黑黑的老鼠屎，莫说让它入口，即连瞅一眼也是受罪的。

我常常鼓励学生在把作文呈交上来之前，检查两遍。第一遍，由自己细查；第二篇，交给同窗好友代查。如此如履薄冰地审查两次，必能抓出一些原本藏匿得很深的臭虫。

有些老师，在批阅作文时，把学生作文里的错字圈出来以后，会一板一眼地把正确的字写在旁边，方便学生学 习。

我从不。

我觉得学生犯错之后，必须自行面对与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真正地汲取教训，从中受惠。我们不能老是把救生圈套在孩子身上，却又妄想他们能够成为海中的飞鱼。精湛的泳术，是在多次辛苦溺水之后，才练就的。

通常我把文字的臭虫从他们的作文里一只一只地揪出来后，总会要求他们回家找“杀虫剂”来灭虫。所谓的“杀虫剂”，当然就是学习语文的葵花宝典——汉语词典啦！

学生认认真真地翻查字典，把正确的字查找出来以后，我要求他们端端正正地把整个句子重抄一遍。

为什么要重抄整个句子呢？

因为单字不成词，如果单独改正他写错的那个字，恐怕就像在沙滩上写字一样，无法在记忆之库长留，转瞬就没了踪影。比方说，有学生把“个子魁梧的爸爸像个巨人”写成了“个子鬼梧的爸爸像个巨人”，事后，倘若老师只要求他把“魁”这个字写上百遍，但却没有让他把“魁”和“梧”连贯在一起学习，当然也就无法强化他对“魁梧”这个词语的印象了。

我要求学生把完整的句子抄一遍：“个子魁梧的爸爸像个巨人”；抄好之后，再把“魁梧”一词写上五遍，便完成了整个改正错字的学习程序了。

我对学生解释，让他们抄写五遍，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要加深他们的记忆。我对他们说道：

“当你们在重复地写着这个词语时，必须把整颗丰满的心放在瘦瘦的笔杆里面，边写边记、边记边写，写完五遍之后，盯着这个词语，默默记它十遍二十遍三十遍，直到它成为你脑细胞的一部分为止。脑和心并用，一次过地把一个你曾犯错的词汇学起来，永远不再重蹈覆辙，这样的学习方式，是最为有效的。有脑没心，错了又错、错了再错，错错错，错错错，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已！”

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最讨厌的是没有原则和缺乏理性的惩罚，最受落的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的教导；有心学习的学生，把这些话听进耳里、记在心上，依照我的办法，努力扑杀文字的臭虫，慢慢地，臭虫也闻风而逃了。

有名女学生江嘉苇(化名)，当我在年头批阅她第一篇作文时，被她吓得魂不附体，短短一篇几百字的作文，居然挤挤迫迫地爬满了48只臭虫，简直是“满目疮痍”啊！

我把她找来，进行辅导，她苦恼地说：

“我记不住那些字的形状呀！同学都叫我做错字大王，我中学的老师也都放弃我了！”

我正色地说：

“嘉苇，听着，如果你不曾放弃自己，世界上就没有人可以放弃你！”

我利用课余时间，耐心地教她辨认文字的偏旁，再向她分析偏旁和文义之间的关系。我把许多以“口”为偏旁的词语写在白纸上：

“叮嘱、叽哩咕噜、叫嚷、唠叨、呼唤、吱吱喳喳、吼叫、嘀咕、咀嚼、呻吟、吩咐、骂骂咧咧、口哨、咳嗽、哽咽、哭叫……”

然后，问她：

“你看，这些词语，是不是都和口有关系呢？”

她一面看，一面啧啧地发出了惊叹声，说：

“老师，我从来不知道中文字是这么奇妙的！”

接着，我将她的作文簿摊放在桌上，把她的错误指出来：

“你看，叮嘱你写成了叮属、骂骂咧咧你写成了骂骂列列，你把别人的口都拿掉了，别人怎么说话、又怎么骂人啊？”

她神情腼腆地笑了起来，说：

“老师，我改过，我一定要改过！”

我又“趁胜追击”：

“你瞧，仓颉把字造得出神入化，你恣意糟蹋，胡乱用，怎么对得起他啊？”

她圆圆的脸浮起了两朵红云，很难为情的样子。

江嘉苇有了纠正错误的决心之后，做作业时，态度便有了360度的转变。以前，遇到不会写的字，她总随便拉一个字来滥竽充数，然而，现在，字典不离手，一不肯定，立刻查阅。有时，写了错字而被我纠正后，她总会写在随身携带的小册子上，一有空便勤读不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勤于除虫施肥的江嘉苇，终于种出了肥硕的瓜和豆。

在年终考试的作文里，只有寥寥四只臭虫在试卷上寂寞地爬着……从48只臭虫灭得剩下四只，是怎样一种飞跃的进步啊！

学习，只要有了正确的态度，无难不克、无坎不跨。

曾经的“错字大王”江嘉苇，如今在一所中学里担任语文老师，天天拿着“灭虫剂”进课室，孜孜矻矻地教导年轻的一代如何去灭虫。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建筑情缘。

牛车水 骑楼风情



文图 · 虎威



牛 车水绝大多数的建筑，都属于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住家的“店屋”。沿街的部分，它们总设有骑楼，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搬入大坡二马路一栋店屋的上层后，我和牛车水的骑楼便有了约十年的亲密情缘。

骑楼在开埠初期便有

牛车水骑楼的起源，可追溯到新加坡开埠初期，莱佛士爵士规定市内的店屋都得含有盖走道，而且都得为5英尺宽。英文是five-foot way，马来语是kaki lima。福建话取kaki之音，把它叫做“五脚基”，后来进入华语词汇，但广东人习惯上称之为骑楼，我便也在这篇文章里这么唤它。

一开始便规定市内建筑设这样的走道，为行人遮风挡雨，是十分明智的。住牛车水的日子里，我不知走了多少回骑楼，受惠于这个古老的条规。有两条路最常用：其一 是从大坡大马路，沿着摩士街走回二马路住家，那是放学必经之路；其二 是从二马路转入广合源街，再往丁加奴街爷爷的家或戏院横街露天市场帮妈妈买菜。



骑楼的视觉元素：店面、楼梯口、柱子、地面装饰



游客在骑楼的商品阵里

两条路线以第二条较精彩。二马路那段，从我家楼下的咖啡店为起点，一路上有香庄、唱片店、书店、饼干糖果店、药材店，转入广合源街则有长长的一段几乎全是洋服店。来到了加奴街，又有杂货店、凉茶铺等等。商店店面各异，且店家常用骑楼来摆货，使行人得穿梭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

骑楼也是许多摊贩仅占用一个角落，就可以讨生活的地方。记得我家那栋楼住户的“楼梯口”，在骑楼边上有一方小地面，一个阿婆就在那里摆地摊卖玉器，我们出入都会经过。店屋临骑楼偶会有墙壁，也总被人使用。二马路与广合源街转角处的药行侧有个印度人，卖零食、香烟、报纸等等，挂在墙上的小柜子是他“店铺”。此外，骑楼里更有算命先生、写信佬、理发师……也摆放路边熟食小贩为食客所设的桌椅。

我家楼下的骑楼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风情。香庄在中秋节之前会将许多“花灯”——包括当年流行的走马灯——挂上，赏心悦目。在春节之前，咖啡店和另一些店铺附设的肉干摊位除了平日的每家一台烧炉外，会增加炉子，骑楼顿时成了油烟弥漫的肉干制作场。

骑楼的“问题”也是它的特色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骑楼是半室外空间。一边只有柱子，另一边是店面和通往楼上住户楼梯的出入口。这么简单的设置却有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首先柱子不是划一的，设计因店屋年代与式样的不同而异。商店名称或漆在柱上，或用灰泥塑造，有一种缀以镜子碎片的最为特别。许多柱子带弧度，应是为了让走在骑楼和街上的人同时都能看到所附文字的缘故。店面的变化来自不同性质商店的

摆设和店门的设计。传统的店门由一块块高而长的木板连成，在1960年代或由可折叠的铁门取代。那年代也流行马赛克，广合源街那列洋服店每家用不同款式色彩马赛克铺地，连成一起煞是好看。还有一些元素是添加的：店家常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挂上竹帘，可进一步遮阳挡雨且有卷上垂下的伸缩性；各个楼梯出入口之上也可能伸出一些招牌，告诉行人楼上住家也是裁缝、医师等营业的所在。

骑楼的内涵如此丰富，有限的空间要容纳多种用途，会不会使它原本的用途——让人们行走——受到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自有骑楼以来，它的“拥挤”便是问题。记得我在念书时写有关店屋论文，便曾读过殖民地时代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因涉及民生，若有整顿皆会快速打回原形！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是在上世纪城市重建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保留意识尚薄弱的年代。牛车水大量老店屋被拆除，路边摊贩完全禁止，许多老店铺相继消失，住户也纷纷搬离。忽然间，牛车水活力尽失，前景甚至令人担忧。所幸它后来毕竟被列为保留区，在多方面的努力下，终于也有了新生命。

在牛车水长大的人回到这个被重新注入生命的保留区，走在骑楼上，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每一处建筑结构依旧，且行人也得穿梭商品阵——骑楼“拥挤问题”这个特色已然重现！陌生的是，大江南北食肆的冒起不再让粤式茶楼专美，大量游客纪念品店的开设更使“此地不属于本地人”的感觉油然而生。最令老牛车水感到混乱的是，有一些老字号还在，但像已玩了“大风吹”，处在不同的位置。或许是旁观者老了，记不清楚？偏生命中越久远的事，年长者的记忆越清晰。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跨越百年的智慧长者周有光

纪念

《汉语拼音方案》

公布60周年

周有光105岁生日照



文·汪惠迪

图·《中国剪报》社

60年前的2月11日，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标志着汉语拼音已经由中国的国家标准发展为国际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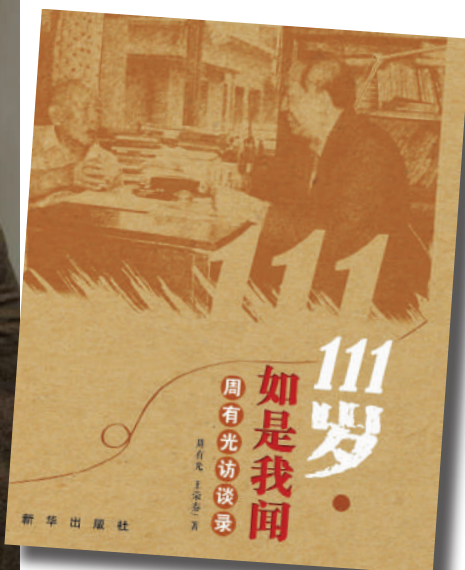
提起《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国际化，人们就会想起周有光先生；提起周有光先生，中国国内和海外众多媒体和个人就会称他“汉语拼音之父”。但是，周有光说：“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个拼音方案在清朝末年就开始研究了，一直到我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周先生还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周有光不应当是‘拼音之父’，他说周有光跟拼音是没有关系的。他说踢足球，一个球已经踢到球门口了，周有光最后一脚踢进去了。这一脚踢进去了，不能功劳全是我，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踢过脚了。我想他的讲法还是很对的。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叫人家不要叫我‘拼音之父’，说我是参加制订者之一还是可以的。”（曹锡华、李梅香编著《百岁学人周有光》第130—13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2月）

这件事在周有光和王荣泰合著的《111岁如是我闻：周有光访谈录》中亦有所见。关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说：“我不喜欢他们这么说，我不喜欢吹牛。”王荣泰问道：“您觉得叫什么呢？”周有光答道：“汉语拼音制订人之一，有的人说是主要的制订人之一，也可以。”

200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



周有光与到访的王荣泰在书房交谈，时年108岁



《周有光访谈录》封面

年，有人问周老如何纪念，周老说：“最好的纪念方法是不声不响地让汉语拼音发挥更多作用。”王荣泰感慨地说：“这就是周有光先生的风范，不声不响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王荣泰历任《中国剪报》社社长、总编辑，《特别文摘》杂志社社长等职，跟周有光是同乡(江苏省常州市)。两人来往十多年，交情深厚。王荣泰将与周老交往的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并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归纳整理周老在许多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汇编成书出版，作为对周老111岁华诞的献礼。这本书就是上文提到的《111岁如是我闻：周有光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下文简称《周有光访谈录》)。此书于2016年1月第1次印刷，问世一年后，即2017年1月，周有光在度过112岁华诞(1月13日)的翌日凌晨三时许在北京逝世。

王荣泰跟周有光有过很多次的零距离接触。在王荣泰眼中，周有光“记忆力超强，谈吐风雅、语言诙谐、条理简明”，谈起他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柳暗花明。与之交流，有一种特别的画面感，你会觉得不是与一位长者聊天，而是与整个历史对话”。(《周有光访谈录》前言第2页)

记述周有光的著作有好几种，单篇文章更多。值得一提的是周有光逝世前两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周老110岁时问世的《百岁学人周有光》，一本是周老111岁时问世的《111岁如是我闻：周有光访谈录》。前者是对六集同名电视人物传记片从策划、筹备、摄制到首播的全过程纪录，后者是与跨越百年的智慧老人周有光所经历的时代的对话。

周有光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是文化的一生，是长

寿的一生。他历经四朝，寿比金石，著作等身，学识渊博，影响深远。如果你想走近他，了解他，认识他，纪念他，学习他而时间有限，资料欠缺，就不妨观看六集电视人物传记片《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或者阅读《周有光访谈录》。

传记片六集是：一、水韵年华，二、执子之手，三、患难与共，四、结缘字母，五、大音之魅，六、多情不老。《周有光访谈录》全书分为七个部分：一、往事流光，二、字母故事，三、心忧天下，四、全球视野，五、居尘论道，六、文化思考，七、达观人生。传记片和访谈录各有千秋，电视片直观形象，访谈录载述甚详。拙文以阅读《周有光访谈录》时随笔记录的形式，撷英转述，以飨读者。

新加坡小国崛起

周有光说：“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有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是民主的，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几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周有光访谈录》第136页)



2015年1月13日，王荣泰为周有光庆祝110岁华诞

周有光所撰《小国崛起》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5月24日，时年103岁。文章开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小国崛起而大国衰落，美国是例外。吹嘘‘大国崛起’，

不是事实。大国衰落，由于宗主国力量下降而殖民地力量上升。小国崛起，由于抓住了发展机会，运用全球化的国际支援。”“小国以及港台小地区的崛起，有一条共同的底线：政治民主，不侵略别国土地；经济富裕，不专靠天然资源(人均GDP超过\$20,000)。”文中提到的崛起的小国共有8个，东亚“四小龙”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3月)

讲到推行汉语拼音，周有光说“新加坡采用拼音，影响东南亚；联合国采用拼音，亦以拼音为拼写中国地名的标准”(《周有光访谈录》第103页)

从世界来看国家

在谈到全球化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周有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他说：“‘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观点改变了。过去是从国家来看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是从世界来看国家。”又说：“爱国教育本来是由国家来看世界，不是世界来看国家。你从世界来看国家就完全可以看到爱国教育，它是狭隘的观念，要扩大、要提高，要爱人类，从人类这个前提来研究问题，那么就不会打仗了……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投票箱里出政权。完全改变了。”(《周有光访谈录》158—160页)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一度被认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谁想到，80多年后，年逾百岁的周有光从“全球化”理念出发，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否定这个论断，提出“投票箱里出政权”的新观点。这说明周有光先生是一个“从体制内服从型转变为独立、自由思想的知识分

子”(《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庆祝周有光先生茶寿文集》第16页，金钥匙华文出版社，2014年7月，香港)

推进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认为，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语文现代化有四件大事：第一，全国普及普通话；第二，文言改为白话文；第三，要整理汉字；第四，给汉字标音。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周有光访谈录》95—97页)后来周先生又完善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指出语文现代化的内涵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标音字母化，中文电脑化，术语国际化。”(《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第183页)

汉语的将来

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了，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汉语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全球五大洲已经创办孔子学院五百多所、孔子课堂一千多个。于是许多人说汉语要变成世界语言了。周有光说：“在联合国各种语言的使用比例大致是：英语80%，法语15%，西班牙语4%，另外1%是俄语、阿拉伯语、汉语，汉语比俄语、阿拉伯语用得少。”“英语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语，它这样一个地位是经过400年。”他在回答“汉语是否可能成为世界流行语言”这个问题时说：“根本没有这个题目。你到外国去讲，人家会笑死的。”(《周有光访谈录》118页)

最后引用周有光的几句名言作为结束语：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

文化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科学道路。科学是一元性的，没有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分别。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

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以别人的过失来责罚自己。不生气有助于健康长寿。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原来，人生是一朵浪花。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专访古筝演奏家 李坤



文·陈梓欣

棋书画，李坤向往的就是前者的闲情逸致和潇洒不羁的才气。李坤的人生哲学是执着追求自我。他最崇敬的历史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魏时期的嵇康大学士。李坤喜欢借助古人的性格特点来宣泄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感，他非常敬佩执着追求自我的高尚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通过古筝雄厚的音调和丰富的演奏方式，将中华民族历史人物的情感和人物性格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赤壁怀古》是李坤的原创作品之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坤以他精湛的古筝技艺带领听众走进赤壁古战场，快速、激昂的音符，组成浪潮般的战争旋律，千军万马博杀的嘶喊声犹在耳旁……

访谈中李坤感慨，人一生只是风尘当中的一粒尘沙，江山美人最后也都归于尘土，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因为人生其实真的很短暂！人生短短数十年应该充份体现一下自我价值，如有余力更应该回报于社会。这是他的人生格言和人生追求目标。

以新加坡为窗口弘扬中国文化

近年来，李坤经常来新加坡参与本地的慈善活动。他说，新加坡是一个集世界金融与文化于一体的国家，繁荣的经济与经典的文化享誉世界。希望能把新加坡作为窗口，把华夏民族文化以及至高无尚的英雄精神与气节通过音乐向世界展示，用一曲曲古韵带领更多的人一同走进美妙的音乐殿堂、领略华夏民族音乐独有的芬芳和魅力。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年12月3日中午，新加坡文艺协会为筹募活动基金在千禧楼举办“文艺飨宴”筹款活动，当天主办方邀请了中国当代青年古筝演奏家、作曲家李坤到场助演。他弹奏的《赛马》、《满江红》和《阳关三叠》，把活动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弹奏的《满江红》：舞台上一束白光，一台古筝，全情的投入，展现了琴人合一的气质境界。

李坤(号琴台居士)，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歌剧舞剧院社会艺术考级评审委员、中国“小演奏家”、“香港中乐团”艺术大赛评审委员、中国音乐家民族管弦乐协会会员。李坤的演奏音色浑厚清透，快速有力，轮指、演奏、拨奏等现代技法的创新与运用更能表达由内而外的“文人侠士”的气质。

近年来，他先后创作改编了《春江花月夜》、《喜庆》、《英雄》、《琴台情思》、《赤壁古战之大江东去》、《雪山欢歌》等多部独奏重奏古筝作品。作品均由中国唱片公司出版。李坤的古筝作品专辑《国乐情韵》也被音乐界视为难得的好教材。

执着追求自我

李坤非常崇拜唐代诗人李白和王维。两者都精通琴



郑文彬近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

艺术追求



文图·邹璐

1 936年出生的郑文彬，今年已经81岁了。看着他身穿工装裤，背着双肩包，背影依然矫健挺拔，消失在乌节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在想，年轻时的他浪迹天涯，是不是就是这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仿佛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真希望他不仅可以留下更多作品，也给我们留下多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点滴回忆。

郑文彬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来得利落敏捷，虽然满头花白头发无可否认地昭告他已经老了。他说为了保持体力，他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会花上两个小时锻炼身体，通过运动，让自己的骨骼、关节轻松一点。但他也坦言，他讨厌运动，因为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他想花多一点时间画画。但是，不可不服老啊！他又喃喃自语道，为了有更好的体力画画，他只能强迫自己必须加强锻炼身体。

在年少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如今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他应该庆幸自己曾经的选择，因为，正是艺术，赋予他不一样的人生。

颠沛流离的童年少年

郑文彬(Tay Boon Pin)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峇眼亚比(印尼语: Bagansiapiapi)，那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由闽南移民开拓的19世纪亚洲最大渔场。郑文彬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移民，从福建老家移居至此，以打鱼为



《渔船归来》(1962) 油画 97cm × 57cm

生，养育了他们兄弟姐妹(五个孩子)。郑文彬排行第三。

郑文彬说，当他到了上学年龄，正赶上日军南侵，占领东南亚，学校里开始教日文，他退学了，放弃读书。战后不久，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大批华人被迫离开家园。所以他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就是在战争的阴影和社会动荡中度过，虽然读书不多，却对社会现实有着比同龄人更深刻的体悟。唯一的一点温暖记忆就是上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教他画画，让他隐约感到，画笔可以代替言语，表达他的心声和想法。

在印尼排华事件的惶恐不安中，郑文彬跟随母亲逃离苏门答腊，移居新加坡。那时，他们家住在后港，当年那里有一大片池塘，潮州人那里养鸭。看到水，无论是海水，还是新加坡河水，又或者是养鸭塘的池水，都会让他感到安心。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最初的生命记忆，他最多创作的是以水为题材的作品。

偶然进入南洋美专

郑文彬进入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简称南洋美专)是一个偶然，但也可能是一个必然。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又必须要在繁华都市新加坡立足谋生，每个人都需要有

一技之长。于是他想到自己对绘画有兴趣，希望学会画画，今后以此谋生。

作为一名穷学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刻苦用功。那时候他就住在美专学校里，从早到晚坚持画画，苦练基本功。当年美专的指导老师有钟泗滨、张荔英等，他们各自的教学方法不同，但由于他们卓越的艺术造诣，深深影响了这些年轻学子。郑文彬感慨地说，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些老师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影响他一生。

1956年，郑文彬从南洋美专毕业。在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做过出版社的美术设计，也担任过美术教师工作，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从1956至1970年的10多年时间里，积极参加赤道艺术研究会(“赤道”)的活动，担任“赤道”美术指导老师。当时赤道艺术研究会拥有会员最多时达300多人，学习绘画的人十分踊跃。教学相长，通过教导年轻学员学美术，也让他的绘画技艺获得锻炼和提升。可以说这是他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更是他清贫而灿烂的青春岁月。

曾经梦想浪迹天涯

郑文彬说，他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总是一个

人默默无闻地画画。但对于时事、社会的关注，以及对人情世故的体察却是敏感的。赤道艺术研究会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反殖、反帝、关心社会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他们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大众服务，甚至一些激进的左派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他虽然不善言谈，内心却变得充实、坚定，富有激情，并将这份激情化作追求艺术的动力。郑文彬说，那时候他吃住都在“赤道”会所，除了上课，就是画画，过着最最简单的生活，吃的是最最简单的食物，内心却像有一团火一样，充满热情，充满力量，画起画来废寝忘食。

为了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他的画笔所描绘的都是普通百姓：他画工厂的女工、忙碌的小贩、三轮车夫、读夜校的年轻人。他也画牛车水的街景、新加坡河上的舢舨(Tong Kang)。他还独自一人北上马来西亚，在登嘉楼(Terengganu，旧称丁加奴)、文东(Bentong)、东海岸各地，用画笔描绘当地渔民出海、归航、渔获、晒鱼、补网等等劳作场景。为了体验和描绘当地人的生活，他长时间观察海水、海浪；观察日光、云影的变化；观察当地人的表情、眼神。听他们的谈话，看他们忙碌劳作。有时候，他会在当地一住就是三两个月。

理想主义者的“降落”

当时政治风潮已经渐渐减退，新加坡经济正在快速成长，城市变迁速度惊人。从前身边的同学、朋友，在各自的艺术成长、事业发展中越来越有成就。原先大家有着共同理想、社会抱负、艺术追求，不知不觉中，大家已渐行渐远，进入不同社会阶层，而他却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闲人”，继续过着他的理想主义艺术家生活。

他向往的生活就是浪迹天涯，尽自己的笔力去描绘普罗大众真实、砥砺的生活，去记录他的时代。那些画面，那些风景，那些人，不是因为美，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真实，最寻常普通的真实。当然，他也从来没想过这些作品在艺术市场的标价问题，他根本没有市场观念，他的价值观就是他的艺术观，他的艺术观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粹艺术追求。

他认定自己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但其实他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家的。他既深入生



《水兵》(1965) 油画 66cm × 99cm

活，又远离生活；他生活在人群中，又远离人群。他认为他的作品反映现实，可是怎么感觉如此脱离现实？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流浪者，更是一个被时代列车抛下的落单者。

真正把他拉回现实生活的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他与一位槟城女子相识，他们是在一次与众多年轻朋友一起结伴同行的旅行中相识。不久，他们结婚了，随着三个孩子的陆续出世，家庭的责任，养儿育女的重担，让这位理想主义者终于“降落”，回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

作品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

我们翻阅郑文彬迄今为止出版的唯一一本画册(这是由“海卉艺苑”于2015年为他举办个展时出版的)里面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是1950到1980年代的。这是他最多产、创作力最为旺盛时期，同时也是绘画技法、创作技巧不断成熟的时期。

从这本经过严格遴选整理而成的画册，不难看出郑文彬创作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是他对于场面场景的撷取和描绘。例如，他的重要代表作，完成于1965年的大幅油画《水兵》，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早在60年代，武吉士(Bugis)一带的繁华热闹和众多美国大兵酗



《新加坡河畔茶室》(1967) 油画 50cm × 66cm



《水乡》(2009) 油画 61cm × 46cm



《收获的季节》(2011) 油画 122cm × 82cm

酒、玩乐、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有关。这些从遥远美国来到亚洲的美军们，面对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总是想远离战争，总是迫不及待想来新加坡度假、买醉。

那时候，郑文彬时常骑脚车经过武吉士，看到醉醺醺闹哄哄的一幕，内心很受刺激，于是想到通过油画表现出来。画面占据主要位置的是酩酊大醉、脚步趔趄、东歪西倒的六位身穿白色水手服装的美国水兵。他们中有的帽子摘下，有的帽子歪戴，一个个烂醉如泥，动作夸张，表情狰狞，举止放肆，仿佛让人闻到弥漫的浑浊酒气。画面深处作为背景，构成“剧情”的是两个穿着短裤制服的马打(警察)，他们似乎在窃窃私语，其实是一种逃避。画家让他们在灯红酒绿中隐去了脸，是一种隐喻，更是一种不必言说的嘲讽。郑文彬说，曾有收藏家要收藏他的这幅作品，但他坚持不卖，要留给子孙，因为那是真实的生活记忆，作品就是他的生活内容，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能割舍，分离会痛。

郑文彬的创作多为场景画面，尤其是劳动者忙碌劳作的场景。画面上，无论是风和日丽，无论是乌云密布，男女老少都在为生活忙碌着。他很少描绘单纯的自然风光，更多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风景。从城市到乡村，从山里到海边，郑文彬总是远远观望，细细观察，满怀

激情地描绘着。实景作品的难度是对人群的动态刻画。要如何在平面的画布上表现出动感、立体感、空间感？用笔、用色都是挑战，并且，这是一场无尽的战斗。画家既要有细致的观察力，又要有精准、恰当、高超的表现力，将富有动感的现场、深具意义的背景以及诸多传情达意的细节融入到作品中。

由于从小看着渔民的父亲在海边劳作忙碌，画册中有多达三十多幅作品描绘了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各地渔民的生活。一样是靠海吃海，各地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以及渔船样式、渔民的装束等都各有不同，形成他笔下一幅幅富有各地风土人情的真实生活画卷。

郑文彬还在延续着他年轻时候的艺术理想：反映现实，关心普通百姓。在他落落寡欢的心底，一直眷念着那个风云变幻的激情时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因此形成他的艺术特色。他的朴实无华的思想和敦厚朴素的情感，历经岁月，杂糅色彩，细致密实地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参考资料：

《郑文彬画集》(海卉画廊，2015)
郑文彬画作网站：<https://tayboonpin.wordpress.com/about/>

人物景点。

《赤道风》 33年方然芊华细说从头



文·林高

《赤道风》去年8月出版第98期。出版人芊华和主编方然是夫妻。发行是夫妻档分内的事。从前年轻的时候，夫妻俩拎着刊物到学校去请老师帮忙卖，看一些校长的脸色。又分次拎着刊物到新山邮寄给邻国的订户，为了省一省邮资。近年来年老体衰，须靠朋友开车帮忙，简丹、临风、黄文杰、郭永发、李选楼等都帮助过他们送书发售。最近两期，永发夫妻俩送方然夫妻俩进新山，问我要不要同行。我说好。

两次，亲眼看他们在新山邮局处理邮寄的事。称重、填表，买邮票、贴邮票。做同样的事做了三十几年，都熟悉了。兜转于不同柜台之间。一半年纪大了，一半性子里那点憨实无欺，只见他们一行一动都谨慎平静，仿佛要送去的是家书。从邀稿、收稿、选稿，打字、排版、设计，印刷、发行、做账，都包了。到了邮寄刊物的时候，心头了了一件事。月英从旁帮忙。



方然与芊华

处理了邮寄的事，我们一起去南方大学赠书给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元兄带我们去吃中餐。又适逢黄逢荣在南方举办翰墨展，黄逢荣是新山资深书法家，工草书，便顺道参观。回程在全新山最好的咖啡店喝咖啡，吃刚出炉的糕点。五个人，来回大半天，好像做了好多事。回家时各拎一盒新山闻名的传统香蕉糕点。

我对方然是由歉意转为敬意的。我答应给他稿却一直没有兑现，见面时他竖起手指说我还欠他一篇稿，没有不悦。我除了向他们鞠躬，说什么都没意思。

在车上，方然告诉我，明年四月，做到一百期就停刊。一百是个圆满的数字。芊华说，明年方然刚好七十五岁。

《赤道风》记录了他们的存在

我与方然芊华相约在草根聊。看见他们一前一后、步履迟缓默默走进草根，心深处不知怎么顿生寂寞之感。今天 Open Book Cafe 没有营业，就我们三个，素怀泡一壶茉莉花茶让我们边喝边聊。

芊华告诉我：“方然69岁(2012年)中风，在加护房看到我，眼眶带泪，第一句话就是：《赤道风》可以停了。”她的言语里有些悲切有些明白：若好了出院，他会继续下去。干嘛呢？我问方然。不舍。他的答案很简单。我问什么，方然的答案总是半句加一句，芊华再给他补上三两句。简淡朴素的衣着，简单平实的语言，夫妻相依傍经营一本刊物。靠个体户经营，《赤道风》是坚持得最久的文学杂志，33年，它的坚持标志着一种信念与意志。他们大概没想到《赤道风》在岁月里亦记录了他们的存在。

赤道风出版社于1985年用芊华的名字注册。创刊号隔年出版。由第十一、十二期合刊起，“赤道风”三字改用名诗人艾青之手迹，属季刊。主编流军，执行编辑方然、杨涌(已故)，编委长谣、冬琴、史英、黎声(已故)。两年后其他编委退出。方然咬紧牙继续做。从第9期开始，《赤道风》成为方然芊华的夫妻行当——搞文学和搞出版兼具双重角色。名称上是“商业注册”，谁都知道这事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聪明人不做。



干嘛扛起来呢，不怕吗？其他编委都离开了。

一念。刚起步，停可惜。方然说。

“你很牛，是不是？”我多少有点知道方然的脾气，想逗他谈开去。想不到他的回答还是很牛：“别人不做，我做。”

就做了33年。满足吗？遗憾吗？不要用半句话回答我哦。

讲得太伟大，不好。方然说。我的眼神转向芊华。她说：那时候，1987、88，有一种悲情，华校没有了，就想坚持把一本华文刊物做下去。方然做了补充：想坚持把现实主义走下去。这是他“牛”起来必须有的动力吧——他的“一念”其实掺和着性子之“牛”与文学之“牛”。

《赤道风》创办之初举办了数场讲座，谈论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方向。诗歌的反响最大。诗歌讲座主席是黄叔麟。出席者包括：长谣、淡莹、南子、吴垠、史英、叶苗、长河、陈剑、郭永秀、蔡欣、华之风、文恺、贺兰宁、严思、周天、佟暖、杨涌、成君、马德、梁钺、喀秋莎、林康、林方、林也、流军、黎声、方然。讨论的提纲根据记录，包括：1. 在众多

文学式样中，诗的读者最少，为什么你选择写诗？2. 你认为构成一首好诗的条件是什么？3. 谈谈你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民歌、欧美各国诗歌的心得与看法。4. 谈谈你对本国诗歌现状的看法和寄望。阵容与议题不小。可以想见，交流与交锋一并激荡出来的星火足以燎原。而所谓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对峙却也足以说明，虽风雨欲来，当年文坛仍有一股发自内心的泉眼在汨汨流动。当年气盛，兼各有志向，不免锋芒带刺。回头去看，烽烟留下一句对现实主义的揶揄——踏着艾青的尸体前进——亦已变成灰烬化作春泥。既往矣！不如让自己去回应现实，让现实去回应文学——不在于抓是非。方然说，“以前不喜欢现代派，交往了觉得人不讨厌。”我静静地听，不十分确定是他的性情对人有所包容，或是时间让他对文学有所吸纳。他说，从前绝不，现在可以接受——对现代派的作品。

妹跟着哥

方然说芊华胆子小，不敢见人。我觉得她有过去妇女的柔顺，怕事。现在她帮忙应对，肩上的担子加重，胆子大了一点，那个温顺样子却是注册了的。她私底下

叫方然为哥。审稿什么的若哥妹俩有矛盾，让步的总是她。我不由得便想象她跟方然办一本刊物的情景。学生跟着老师，妹跟着哥，打字跟着文稿，编辑跟着主编，你看，绿色涸染的山坡上有一点白有一点红起伏伏在移动，前方是峰峦与云霞弥漫的斑斓。她是有期盼的。方然说：回头，再选择，还会搞出版。芊华说：我不一定，他做，我只好帮他。芊华谈到压力。接手搞《赤道风》的头一两年里不断收到匿名信、匿名电话。教补习是方然讨生活的路（一天教三组，早午晚），匿名信甚至寄给学生家长，矛头指向他：方然有什么资格当主编？这些都过去了，芊华说起来一点火气也没有。她含笑说：认识了很多，可爱的多，讨厌的少。

方然的脸上是经过日子冲击后沉底的一点平淡。我问，没有遗憾吗？他“颐指”坐对面的芊华，做一个打瞌睡的样子，说：看她每天晚上搞到很迟。不年轻了，打瞌睡，一边看稿。多迟呢？有时候到两三点。芊华插嘴：美编有时候很晚了还回电邮。现在用电脑排版，有美编协助。回溯到当初，一点一滴都靠人工。作者投稿用稿纸誊写，芊华用双鸽牌打字机打字。打好要裁剪，用细方格纸贴版。校对发现错字，就一字一句剪贴，更正。题目为求美观，另外请人用电动打字，每方寸3毛钱。内容字从12-15级，按每方寸6-8毛钱计算。为了省钱，方然有时自己用毛笔写题目。一点一滴耕耘，到今天。方然说：以前我里外要管，觉得自己苦，现在觉得她苦。

方然中风后失去言语能力，亦不良于行。芊华说，方然在家疗养将近两年，期间有位仁心朋友（不愿透露姓名）风雨不改，每天上门为他针灸，施医赠药。还有一位是黄信勇，偶尔也来家针灸。都是有心人啊！芊华年纪已六十。过简单的日子他们就满足——却不是你想简单过日子，日子就变得简单。举一例，2000年，银行忽然颁布新条例，商业银行户口最低存款必须一万元，否则每个月收手续费若干云云。听到消息如晴天霹雳（芊华语），向朋友借钱挡一下，又开不了口。对方然来说，每天睁开眼，还在，就打起精神过日子。他补充一句：压力就是动力。芊华想得比较多：老了怎么办？我打开天窗说话，他们节俭过日子，情况一摸见底。我引到这话题上是想掂量文学在三十几年里、在他们心中，两边的重量摇摇摆摆到底怎么样了。

创办初始（即80年代末）每期销售两千本，后来降为一千，后来八百，后来七百。（以上销量含海外约两百本）。从2008年，第70期，改为四月刊。越做越好销量反而越减越少。方然脸上保持淡然而不失他那点脾性，看看芊华，她笑得很真。她说《赤道风》不办了要做什么？方然是有些为芊华担心的。膝下无子女。他说，芊华和弟妹的感情很好，他比较放心。他一脸平静。

我静静地听。他把信任放在亲属上——他不是退而求其次。我看到难得看到的平静。我感到温暖。时下大家都在想，得有钱呀！有钱便有支持自己活到老的信心。1988年芊华的母亲（54岁）中风，瘫痪卧床十年。她经济上难以接济，时间上分配不出来帮忙照顾。芊华是老大，有八个弟妹，弟妹有的当兵有的在读书。她感到十分内疚。四妹高中毕业便留家全职照顾母亲。父亲患青光眼兼白内障，几乎瞎了，芊华要拨出时间带他去看医生，一等整半天。里外都是压力。而今父母都往生，弟妹都成家事业有成，有的当公务员、人事经理、行政总厨、海事工程师、医师。生活就是这样磕磕绊绊，含泪谈笑过去。文友雨青（已故）曾说他们不是傻，是痴。其实人生总是，半痴半傻才足以完成那些必得靠耐力去完成的事。

不完美与完美

自2008年起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出版。宗乡总会的中华语言基金也给予赞助。经济条件好些，刊物的设计有了很好的改善。记得是75那一期封面是一只老虎，整体感觉更是满足的，也看到影响力，听到称赞。却就要停刊，似乎在说明：不完美与完美总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曹敬华老师（南洋女中）很为学生少了一个发表园地而惋惜。方然和芊华对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朋友都感念在心。他们没有忘记黄继豪、李树端二位老师当年给予的大力支持。还有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新中学、圣若瑟书院、立化中学、莱佛士女中、励仁高中、圣尼各拉女校、中正总校/分校、义顺初级学院等院校的老师热心协助售卖刊物。成泰忠先生（成君）任商务印书馆经理时以刊登广告，提供商业文件给芊华打字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芊华的笔名原来叫小岩，成君鼓励她，小岩长大了。于是改用芊华。芊华寓意丰富，这名字好啊。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新加坡华语的国际定位



文 · 新沼雅代

目前，英语实际上是世界的共同语言。日本学者加藤晴久曾指出：一般来说，语言的兴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管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多么好，只有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力量超过其他语言的群体，这种语言才会超越国境被广泛使用。^[1]

另一位日本学者染谷泰正也指出：同样，19世纪后半叶以后，英语普及于全世界不是源于英语的性质，而是首先作为英帝国主义世界战略的一部分，然后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压倒性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力量，而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2]

在网上搜索“汉语、世界通用语言”时，查到很多。比如，“在21世纪汉语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吗？”、“未来能取代英语在世界地位的语言可能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等等。以上说明，将来汉语有可能成为次于英语，或者超越英语的全球通用语言。本文要论述汉语、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的关系。

学习者的需求量的增加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被称为华语。“Mandarin”本来是官话。现在，Mandarin多指中国的普通话。相对于中国的普通话，海外华人的华语被称为Standard Chinese。Mandarin有时会包括海外华人的华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中文的一些报道和数据。

《侨报纽约网》上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汉语在海外也日益受到热捧。目前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3]，这里使用“汉语”。

下面看一下，Mandarin和英语的母语话者和第二语言话者的总数对照。

这个资料摘自于维基百科，只可以作为简要的参考。

表1列出，Mandarin母语话者有八亿九千七百万人，英语母语话者有三亿七千一百万人(资料的注释，如果包括方言的话，Mandarin超过英文，但总体排名不变)。从表1可以认为，Mandarin母语话者(第一语言

表1 母语话者和第二语言话者的总数对照

Rank	Language	Family	L1 Speakers	L1 Rank	L2 Speakers	L2 Rank	Total
1	Mandarin Chinese (incl. Standard Chinese)	Sino-Tibetan, Sinitic	897 million	1	193 million	4	1.09 billion
2	English	Indo-European, Germanic	371 million	3	611 million	1	983 million

摘自：Ethnologue 2017 20th edition, Wikipedia “List of languages by total number of speakers”^[4]



话者)和第二语言话者的定义不明确。比如,双语话者(bilingual)的新加坡华人,他们算是英语母语话者还是Mandarin母语话者?

“汉语”、“普通话”、“华语”等的区别

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汉语”词汇的解释是:

汉语: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

中文:①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②中国语言文学,特指汉语言文学

普通话: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官话:①普通话的旧称。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北方话也统称官话。②官腔

华文:指中文。

华语:指汉语。

华人:①中国人②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5]

在2010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中,“华语”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不同,“华语”跟“普通话”被联系起来了。《全球华语词典》的解释:

汉语:无。

中文:无。

普通话:跟《现代汉语词典》一样。

官话:无。

华文:跟《现代汉语词典》一样。

华语: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以汉语普通话为基础。

华人:跟《现代汉语词典》一样。^[6]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中方发表了“大华语”的概念。李宇明说:“大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最重要的是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成,欧洲华语略有雏形。”^[7]

“大华语”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Mandarin Chinese和Standard Chinese的模糊性给予了有效的回答。普通话代表Mandarin Chinese,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代表Standard Chinese。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通过将海外华人的华文定位为普通话的亚种,将导致建立以中国的普通话为核心,以海外华人的华语为周边的结构。语言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所以这种结构不限于语言。这个结构也可以说反映了中国对于海外华人和社会的想法。

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

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不算是“离散(diaspora)”。史书美也指出:大部分汉族移民都是受到经济诱因的驱动才选择定居“边疆”的。“中国离散(Chinese diaspora)”这个概念仍然把台湾和东南亚的汉人与中国“故乡”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便他们已经在中国境外住了好几个世纪……即便他们在政治上已不再效忠于中国。^[8]

在已经普及英语的新加坡,发生“汉语学习热”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有可能推进新加坡的华语教育。但是,“汉语学习热”也意味着,承认新加坡华语被中国的“大华语”概念所吸收。

笔者认为,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有很多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别很大。英语没有现在这么普遍的时候,他们为了交际需要共同的语言。新加坡华语经历了华人社会和英国、马来、印度人社会的双重过滤,以及受到了汉语方言的影响以及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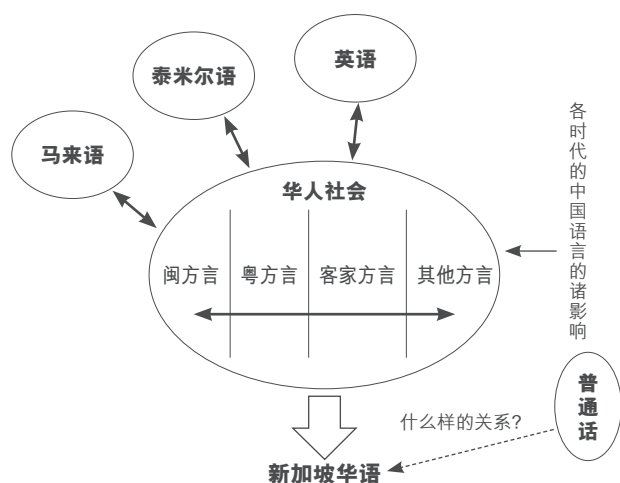


图1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结构

经过很多语言的接触，他们的语言排除了多余的因素，进行简便化，后来变成了lingua franca(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共同的语言)。史书美还指出：华语包含了大约四十几种语言，而彼此之间的差异又是如此地大，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往往无法理解对方在说什么，更不用说它们所形成的混合语了。毕竟，语言是活的。所以，华语语系是多音和多语的。^[9]

把以上所述的内容，可以总结成图1。

一般来说，到南洋的移民是从郑和出使西洋以后开始，郑和出使西洋带动华人移居海外风气。虽然明、清大部分时期实行海禁政策，但华人大量迁移国外、世代侨居南洋也是在明、清时期。^[10]每个时代的移民都把当时中国的语言(包括方言)带到了南洋，影响了新加坡华语的形成。

笔者认为，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形成的过程不一样。普通话有一个全球传播的未来目标，一开始是中国语言的统一和文盲的消除。新加坡华语在多语言、多元文化社会上被迫切需要的结果，可以说特化为多语言、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工具。此外，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主要区别在于新加坡华语是在与英语并存的前提下存在的。以前在新加坡，反对英语的优势，但是现在在新加坡，英语的实用性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有在中国和新加坡生活的经验，从一个外国人的客观角度来看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可以认为新加坡华语不仅仅是普通话的变形。在新加坡讲普通话，把要说的意思传达给对方会更容易一些。比如说，在新加坡，即使不懂普通话的词汇，也可以用英语词汇代替

传达意思。一般日本人英语讲得不好，但是，实际上他们知道很多用片假名的英语词汇。另外，虽然笔者的文化背景跟新加坡华人不同，但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分享各种感受，容易分享常识也会能顺畅的沟通。结果，对笔者来说，在新加坡讲普通话让对方能听懂的机会更多。

虽然普通话和华语在语法上和词汇上基本相同，但实际使用上并不统一，而华语的运用则扎根于当地。史书美也指出：

华语语系文化“非离散”和“地方性”的特质因此得到突显；华语语系文化成了所属民族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和多语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构成的层面来看，华语语系文化是跨国的，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华语语系文化却是在地的。^[11]

基于以上所述，新加坡华语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如下：

一，成为新加坡华语(或者与邻国合作，成为东南亚华语。)

二，作为普通话亚种语言(“大华语”概念)。

新加坡华人已经具有稳定的生活和经济实力，现在在考虑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文化的阶段。新加坡吸收英语，并将其升华为“Singlish”，新加坡英语可以说是新加坡社会的文化之一。

作为一个新加坡粉丝，想象新加坡华语将被称为“Singarin”或“Sindarin”等也是非常有趣的。

(作者为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

注释：

1. 加藤晴久、「言語と文化の多元主義のために」朝日新聞1996年10月30日。
2. 梁谷泰正、「英語の国際的普及の諸相--英語の現代的位置づけと英語教育への視点--」1996年1月24日、未刊行論文<http://www.someyanet.com/kamakuranet/kokusaieigo.html>(2017年12月27日閲覧)。
3. 《侨报纽约网》，<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2017年11月28日阅览。
4. Ethnologue 20th editio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2017年11月30日阅览)。
5.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6. 《全球华语词典》第1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7.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月，第1期，2-13页。
8. 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第9卷，第2期，105-123页。
9. 同注释7。
10.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出版。
11. 同注释7。

一个人的 加冷河畔(组诗)



文·齐亚蓉

(一)

最初的浪迹天涯
谁又说得清
抬起腿，就已千山万水
每一次驻足，每一次回首
泪水、汗水湿了一地落红
蕉风椰雨的洗礼中
默念着梧桐又兼细雨

玉兰花开的时候，与你期不期而遇
千里万里，只是为了寻你
从一条河蹚进另一条河
挥泪作别的痛从此不再提及

(二)

我的世界瞬间静了
风停了，雨住了
就连鸟雀都已禁声
心的喘息，缓慢而清晰
含笑的泪水，与你合二为一
打着漩儿，渐渐远去

蓝天白云是必须的
彩虹则可有可无
时间似乎静止不动
草尖上的露珠也已成为永恒

(三)

坐在你的身边
听你吟唱久远的歌谣
小渔村的往昔，狮城的来历
蕞尔小岛的荣光，小红点的不易

紧握的双手慢慢松开
曾经的苦乐变作了花草
从我的手心跳落
跟随你的脚步，一路蔓延

(四)

为你，我写了一首诗
我的诗，就在我的眼前
无关江湖，无关风月
只是一个人的河边
绿水白雾，苍苍茫茫
只是一个女子
古城生长，狮城老去

多久了，不曾逆流而上
那落英缤纷的玉兰
我的身影，我手中的花瓣
你心里的柔波荡漾

多久了，不曾回头张望
那铺满鲜花的山岭
我的脚印，我脸上的泪水
你眼里的云淡风轻

他们说我把日子过成了诗
我说我把诗过成了日子

(五)

在你的身边，我回到了从前
手脚慢了，日子慢了
头脑简单了，笑容舒坦了
头顶的光环不见了
心里的牵绊不见了
一整天对着一朵花
不必多说一句话

他们说这是一种浪漫
我说这是一种自然

(六)

日子慢了，月光悠长而淡定
一步一步走过我的梦境
日子慢了，阳光细碎而优雅
一寸一寸移过我的头顶

我的梦清晰而朦胧
一条河，一条宁静的小河
一个人，一个乐水的女人
岁月悠悠，河水悠悠

你流淌着岁月
也流淌着我的梦

(七)

一个人的加冷河畔
尘嚣离我越来越远
是非成败化作了青烟
天蓝蓝，水蓝蓝，白云悠然

灯红酒绿不在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里只有虫鸣蛙鼓
人间烟火熏染过我的味蕾
我的灵魂被你冲洗得清清白白

伤感只是别人的想象
静默是我最好的解说
一个人的加冷河畔
不孤独也不寂寞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设立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源》杂志特开辟《本土文学》栏目。

该栏目已设立“《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每年从获本刊发表的入围作品中选出一名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土文学》栏目将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剧本(短剧、小品)”、“诗歌”四种体裁的作品。以下是2018年“《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 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 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为宜。

投稿: 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 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 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 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rong@sfcca.sg。

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 联络人: 谭瑞荣

☞ 电话: 63544078



微信二维码

敬请关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微信公众号

如今只要一机在手,便能时刻关注宗乡总会,轻松掌握新加坡的文化资讯。

担心错过宗乡总会的精彩活动吗?现在只需透过总会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华社消息及总会最新动态,此外还可线上报名活动,快捷便利。

总会微信公众号所刊载的《源》和《华汇》杂志精选文章,带领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新加坡的风土民情、人文地貌,随时随地融入真正的新加坡。

只需要开启微信,扫描上图二维码,新鲜资讯每周三准时推送。

逾20载丰富经验

把您的**创新意念**在**印刷品中**传递

从开业的第一天起，我们对客户的每一个需求都全力以赴。随着一站式出版和印刷中心配备了最新的科技，我们将秉承优良服务传统，令您称心如意。

先锋印刷 - 让您的创意迈向成功！

◆ 设计 / 印刷 / 数码媒体：杂志、刊物、年报、日历、特辑、画册、网站设计 ◆



任何询问，欢迎联系林碧峰先生(9037 9725)

PCL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PCL PRINTERS (PTE) LIMITED

电话：(65) 6745 8733 | 传真：(65) 6745 8213 | 电邮：pclprinters@pnl-group.com | 网站：www.pcl.com.sg

